

新華時事叢刊

正義的審訊

蘇聯審訊本日細菌戰犯案經過



新華書店發行

訊 審 的 義 正

過經案犯戰菌細本日訊審聯蘇

· 刊叢事時華新 ·

訊審的義正

本日訊審聯蘇
過經案犯戰菌細

發行者

編輯者

新華書店

新華時事叢刊社

一九五〇年三月

1—10,000 [京1]

目 錄

蘇聯國家檢察機關對日本細菌戰犯山田乙三等十二人的起訴書	一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案詳情	三
一 審訊各被告	
二 訊問證人	
三 蘇聯法醫學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四 蘇聯國家檢察官的發言	
五 辯護律師的發言與日本細菌戰犯們的最後申辯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案的判決書	五
馬耶夫斯基評伯力審判日本細菌戰犯案	五
正義的審訊（『人民日報』時評）	六
* * *	
蘇聯政府關於日本細菌戰犯問題給我國政府的照會	六
我國政府同意蘇聯政府提議審訊日本細菌戰犯的照會	七
『真理報』論懲辦日本戰犯	七
戰犯必須歸案法辦（『人民日報』社論）	六

審判細菌戰爭罪犯，爲人類安全而鬥爭（新華社社論）……………七

附 錄

日寇製造殺人細菌的舊地鞠家鄉人民的控訴……………	三
前日寇細菌工廠平房地區視察記（重崙 桂圓）……………	六
地下殺人工廠——東京是細菌戰的中心（日·『赤旗報』）……………	九
一個目擊者的控訴（蕭凡）……………	九
日寇曾在我國散佈鼠疫毒菌……………	九
日寇細菌部隊在北京製造毒菌的事實……………	九

蘇聯國家檢察機關對日本細菌戰犯

山田乙三等十二人的起訴書

許多年來，帝國主義的日本是遠東侵略的主要溫床。

帝國主義日本的統治集團，在與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實行罪惡的同謀之後，策劃、發動並進行了反對愛好和平人民的侵略戰爭，以便與希特勒德國共同建立世界霸權。

這些侵略戰爭的目的是企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國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極端擴張主義的意圖，表現在通過武力吞併愛好和平的日本鄰國大片領土，以建立這樣的一個殖民國家上。

從決定日本政策的政府領袖所作的一系列的公開聲明中，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集團的侵略慾望，達到了怎樣的程度。日本主要戰犯之一，日本侵略的軍國主義集團的「思想家」橋本欣五郎，在九四二年一月五日發表以「大東亞帝國勢力範圍」為題的論文寫道：這個「勢力範圍」應包括下列數國：「日本、滿洲國、中國、蘇聯的遠東部分、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阿富汗、澳大利亞、新西蘭、夏威夷、菲律賓和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各島。」同樣，按照日本天皇的特別勅令而建立的直屬於日本首相的「總體戰研究所」，在它的計劃與草案中所規定的所謂「大東亞」版圖，也是這樣確定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其罪惡的侵略計劃中，認爲反蘇是主要任務。在日本軍閥的戰略計劃中，蘇聯經常是被列爲「第一個對象」。在日本居民中間廣泛地宣傳反蘇掠奪戰爭。完全受日本政府情報局所控制的一切日本新聞機構，特別從事這種販賣戰爭的宣傳。

日本統治集團在履行其犯罪計劃時，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動：一九三一年曾製造「瀋陽事件」，日軍侵略滿洲並佔領滿洲；一九三七年，日軍侵略中國，製造了所謂「蘆溝橋事件」；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在哈桑湖地區進攻蘇聯，但被蘇軍擊潰；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友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哈爾新——葛爾河地區，但也被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軍隊擊潰；一九四一年末，日本軍國主義者將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希特勒德國站在一邊。

只有在蘇軍決定性地擊潰了日本的主要突擊力量——集中在滿洲的關東軍並引起日本向同盟國投降之後，日本的侵略才告結束。

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相關聯的事件，已在東京的日本主要戰犯的國際審判中審查過。國際軍事法庭已充分證實：日本統治集團與希特勒德國一道策劃、發動並進行了侵略戰爭。日本多年中曾積極地準備大規模的反蘇侵略戰爭。法庭確定日本在一九三八年於哈桑湖地區和一九三九年於哈爾新——葛爾河地區進行反蘇侵略戰爭的事實。法庭也同樣確認日本與希特勒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進入了旨在反對人類和平的犯罪同謀。

法庭也證實了日本大爲違反關於戰爭的法律與慣例。這表現在日本軍閥對戰俘和佔領區內自由居民的獸行和不人道的待遇上。

關於目前一案的調查，業已證實：在計劃與準備反對蘇聯及其他國家的侵略戰爭時，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曾打算大規模利用、並且也部分地利用了犯罪的工具——細菌戰武器，來整批地滅絕人類。

組織特種部隊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

調查證實：在奪得滿洲後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即組織了細菌實驗所，並把這一實驗所包括在日本關東軍中。實驗所由石井四郎主持。石井四郎在日本以細菌戰思想家聞名，後任中將軍醫官。在該實驗室中研究利用急性傳染病細菌以進行攻勢細菌戰。

據前日軍少將軍醫被告川島清供稱：按照天皇裕仁的秘密勅令，日本參謀本部及陸軍省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就在滿洲設立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兩個極秘密機關。爲了保守秘密，其中一個在石井的實驗所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機關，即命名爲「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另一所則叫做「關東軍獸類傳染病試驗局」。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之後，這兩個機關即改名爲「第七百三十一號部隊」與「第一百號部隊」。上述石井四郎被任命爲第七百三十一號部隊長官，獸醫隊少將若松被任命爲第一百號部隊的長官。

這些部隊的工作人員是由細菌學專家和由受最著名的細菌學家所指導的科學與技術工作者組成。僅第七三一號部隊，即有三千人。這一事實證明了細菌部隊工作的規模。

日軍司令部撥出頗大一筆款項來維持準備細菌戰武器的部隊。例如，一九三九年，即在離哈爾濱二十公里的平房車站地區，建立了一個擁有許多實驗所和辦公室的大軍事地區，供第七三一部隊居住。大批物資儲蓄起來，軍事區周圍劃爲禁區，以嚴守秘密。該部隊在安達站設有自己的飛機場和特別試驗場。第一百號部隊在長春以南十哩的孟家屯地區，也有廣大房舍、特別裝備及大片土地，供其使用。

七三一部隊與一百號部隊下面轄有許多支隊。這些支隊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在戰爭中實際應用兩部隊所製造的細菌武器。細菌部隊及支隊直屬日本關東軍總司令管轄。

除證人的證言與被告的口供外，此事並爲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發佈、而於一九四五年在滿洲爲蘇軍繳獲的有關組織與調動七三一部隊的四個新支隊的命令所證實。

繼梅津美治郎任關東軍司令，現爲本案被告之一的山田乙三將軍，也在其口供中證實細菌部隊會由他直接統率。

山田在描寫第七三一部隊的特性時供稱：「……組織七三一部隊的目的，在於準備主要是對付蘇聯而又兼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細菌戰爭。」根據山田的口供，日本也會進行對其他國家的細菌戰爭的準備。山田並供稱，第一百號部隊的工作是製造細菌戰爭所用的細菌武器。此外，第一百號部隊「並奉令進行破壞行爲，以富於傳染性的細菌投入牧場和蓄水池。在這方面，第一百號部隊在其工作中，與關東軍司令部謀報處有密切聯繫……。」

前日本關東軍獸醫隊長、獸醫隊中將被告高橋巴供稱：「獸類流行病部隊」的任務，是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爭和破壞活動。這些部隊及它們的支隊，有計劃地進行細菌學研究，意圖找出可以作爲細菌武器的各種最有效的細菌，並找出大規模繁殖它們的方法以及利用它滅絕大批人類和傳染牲畜、莊稼，造成經濟損害的技術。

七三一部隊有八個處。其中只有一個處（第三處）處理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事宜。但是第三處的工廠也製造名叫「石井式炸彈」的細菌彈的彈殼。這些炸彈是用來由飛機上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的。七三一部隊的其他各處，全是在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的事宜。

初步調查的材料證實，第一處專門爲了細菌戰目的而研究和培育鼠疫、霍亂、瘧疾、炭疽病、傷寒及副傷寒與其他疾病的病菌，以便在細菌戰中利用這些病菌。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被用來實驗的，不僅有動物而且還有活人。爲了這一目的，還組織一個內部監獄，以便拘留二百到四百人。

第二處——所謂實驗處，在試驗場上並在戰鬥情況中試驗細菌武器。第二處統轄着特種航空隊；航空隊擁有裝着儀器的飛機並在安達站有機場。該處下轄專門培育與繁殖用於傳播鼠疫的科。

第二處製造散播細菌的特種武器：自來水筆式和手杖式的投擲器，瓷瓦器炸彈等。從在日軍檔案中找出的破壞小組的裝備表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採用自來水筆式投擲器作為標準裝備。

這些處中有一處叫做「教育處」。該處為日軍戰鬥部隊和破壞小組訓練知道如何使用細菌戰武器的專門幹部。

爲了大量準備足夠進行細菌戰所需的細菌，七三一部隊設有生產（第四）處。正如該處處長被告川島所說一樣，該處成爲大規模生產各種細菌的「工廠」。該處配裝有效力宏大的儀器，分爲兩科，各科均能獨立製造細菌。第一科有下列主要裝備：四具準備細菌培養液的鍋爐，每具均有製造一噸培養液的生產能力，十四具對培養液加以消毒的熱壓器，每具長三公尺，直徑一公尺半。這樣的熱壓器共有三十具。七三一部隊長官石井發明特別培養器。第一科有兩個冷卻培養液的房間。每間可同時容納多達一百個培養器。這一科總共有五個整溫器，總共可容六百二十個石井式培養器。第二科有兩個鍋爐，每個容量爲二噸，八個熱壓器，每個可容六十具培養器和其他裝備。該處並有保存製成「產品」的特別冷藏器。

根據有關七三一部隊培養細菌主要設備的生產能力的現有材料，專家們已發現在一個生產週期（爲時僅數日），僅七三一部隊的上述裝備即能生產不下三萬萬億微生物。專家們強調指出，考慮到生產的期限，應該認爲這一細菌產量是非常大的。

這種巨大的生產量使七三一部隊與第一百號部隊用公分來計算他們製造出的細菌團。這說明了被告們在口供中爲什麼談到用公分來計算細菌數量。此外，還關涉到直接從培養液浮面上取出的乳狀稀薄細菌團的重量。

因此，在說明七三一部隊的生產能力時，被告川島供稱：「根據它現有的設備和生產能力，生產處每月能製造鼠疫細菌三百公分。」

另一被告唐澤提出同樣的口供：「準備細菌的一處的生產能力，能提高到月製鼠疫細菌三百公分，假如一切設備均被開動的話。」

有如調查所證明和專家們所證實的，所有這些大批的病菌（其中包括鼠疫、霍亂、傷寒及其他病菌）都是爲了生產細菌武器，以大規模屠殺人民的。

在七三一部隊和其支隊中也進行着大規模的培養跳蚤而且將細菌傳染給它們的工作。老鼠和其他啮齒類的動物不僅受到細菌部隊人員的培養，而且還受到關東軍正規部隊爲從事大規模屠殺人民的目的所派遣的特種部隊的培養，這些動物是被用來培養跳蚤和傳染病的。關於跳蚤培養的規模從七三一部隊中存有四千五百具孵育器這點，就可得到說明，這些孵育器是以啮齒動物來培養跳蚤的。

像被告們所供認的這些孵育器的效能，可在一個短時間內製出數公斤染了鼠疫的跳蚤，據專家估計，這數目相當於數千萬個跳蚤，這些跳蚤都專門作爲細菌武器之用。

據證人森田提出的證據，培養和繁殖跳蚤的規模，從下述事實中也可得到證明：即僅在海拉爾的第五四三號支隊中，一九四五年夏季一次就養了近一萬三千隻老鼠。

初步的調查證實，日本細菌戰部隊在華中及華南曾進行了類似的細菌戰準備工作。它們的暗號是「波」「榮」，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間，這些部隊是由被告少將軍醫官佐藤統率的。

據被告佐藤親自供認，「榮」部隊擁有巨大培養和繁殖細菌進行細菌戰的能力。

據被告山田的供詞，日本陸軍「批准了並在軍備單上列入了使用細菌武器的三項主要方法：從空中散佈細菌，投擲細菌彈，最後是使用暗中破壞的方法。」

根據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專門裝備的飛機、專門訓練的軍事部隊及破壞活動組，要在敵人

的前綫和後方散佈大量致命的細菌，如像鼠疫、霍亂、猩紅熱、鼻疽、炭疽熱及其他烈性的傳染病，以各種可能的辦法在居民區、貯水池、水井、穀物和牲畜中散播細菌。

日本帝國主義者蓄意採用迅速散播致死的細菌這種手段，他們在他們卑鄙的計劃中規定向軍隊和向和平居民散佈鼠疫、霍亂等傳染病，根據他們的計劃，這種傳染病必須造成可怖的瘟疫流行並且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慘死。他們準備運用這種對交戰國和中立國的和平居民都有極大危險的慘無人道的武器。

對活人的罪惡實驗

測驗細菌武器的效果的主要方法，就是有系統地和大規模地對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的實驗。

這種罪惡的實驗曾經施之於那些被日本憲兵機關確定要刑訊致死的中國愛國分子、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抵抗運動的參加者以及蘇聯公民。

根據調查所證明：日本細菌部隊人員在日本關東軍司令的認可和同意之下，曾經採用罪惡的實驗來殘殺人民。

被告山田承認，他曾經准許用活人作實驗。山田供認：「我……准許作這種實驗，因而就實際上批准了強力消滅那些被關東憲兵機關和我屬下的日本軍事機關送去作實驗的中國人、俄國人……」

作為證人而受訊的古市提供了關於對人傳染傷寒症的實驗的證言。他供稱：「……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我奉第一處處長田部井之命第一次參加對七三一部隊的監獄所拘禁的人傳染傷寒症的實驗。我預備了一公升的甜水，我在其中投以傷寒菌。然後我用水把這杯甜水沖開，分給約五十名中

國犯人喝，就我所記得的他們是戰俘，其中若干人先前曾受過預防傷寒的注射。」

被告川島清在被訊關於第七三一部隊第一處的活動時供稱：「七三一部隊曾用活人廣泛地進行實驗，以測驗各種致死細菌的作用。被日本反諜機關確定處死的關在監獄裏的中國愛國分子和俄國人就是這種實驗的材料。七三一部隊設有監禁犯人特別的監獄，要受實驗的犯人在這種監獄被嚴密管制和隔絕；爲了要掩飾這種陰謀，七三一部隊的官兵把經受這種實驗的人稱爲「木材」。」

在接近戰綫的戰地，這種對活人的慘無人道的實驗也在具有特別設備的靶場上進行。先把犯人綁在靶場的鐵柱上，然後在它們身上實驗各種細菌彈的效果。

被告唐澤供稱：「常用活人在戰地狀況下實驗細菌效果時，我有兩次會親自在靶場上。第一次我在靶場上是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當時有十個人被押來，他們被綁在事先栽就的柱子上，彼此相隔五米。然後用電在五米之外爆發爆裂彈。結果，受實驗的幾個人被炸彈碎片炸傷，事後我知道，他們同時也受到炭疽熱的傳染，因爲炸彈裏裝有炭疽熱病菌。第二次是一九四四年春季，當時有十個人被押來，他們和第一次一樣被綁在柱子上。然後在距離那些受實驗的人約十米的地方爆發裝有鼠疫細菌的炸彈。」

另一個參加在安達站附近的靶場上作這種罪惡實驗的被告西豐彥供稱：「一九四五年一月間，當時我在安達站七三一部隊的靶場上，我目擊七三一部隊第二處處長井狩中校會同該處科學人員二十木對十個中國戰俘傳染瓦斯壞疽症的實驗。這十個中國戰俘都綁在相隔十米至二十米的柱子上，然後用電爆發炸彈，結果，他們都被爆裂彈炸傷，都受瓦斯壞疽病的傳染，一星期後，他們全都異常悲慘地死去。」被置死的人的屍體在監獄附近七三一部隊所設置的特別火葬爐中焚毀。本案中所訊問的證人和被告們供認了關於被當作「實驗材料」而帶進七三一部隊特別監獄密室裏的所有的人所受到的慘無人道的刑訊、暴行和侮辱。

證人倉狩供稱：「在每一層樓都有若干實驗室，中間有幾個小房間，關着要受實驗的人，小隊長田坂少校對我說，這些人在七三一部隊裏叫做「木材」，我記得很清楚，關在這些監房裏的除了中國人外，還有俄國人。在一個監房裏，我看見一個中國婦女。關在監房裏的人都上着腳鐐。有三個中國人沒有手指，另外還有一些人只有手指的骨頭。芳村向我解釋，這是對他們實驗凍傷的結果。」

作爲證人而受訊的前日本集中營副主任山岸供認：「我不記得那些解到七三一部隊而被弄死的每個人的名字。現在我只記得這幾個名字。蘇軍兵士吉姆琴科。他一概拒絕供出關於蘇軍的任何情報。在我准許之下，曾對他施以強制手段。偵查官對他用刑，綁住他的手和腳吊在樑上。然而吉姆琴科一句話也不招。我於是決定處死他，因此把他送到七三一部隊去。」

被告川島供稱：「如果犯人儘管受到致死的細菌的傳染而仍然痊癒，他們還免不了要受一再的實驗，一直繼續到他因傳染細菌而死。受傳染的人被當作各種治療的研究品，他們還是進平常的飯食，在他們完全痊癒之後，他們就被跟着用來作關於傳染另一種細菌的實驗。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從這個死亡工廠裏生還。」

日本警察機關和滿洲日本軍事當局奉命在與七三一部隊長官取得同意之下，把被囚禁的中國人和蘇聯公民送到七三一部隊裏去，用作所謂「調查」的「特殊材料」。爲了掩飾這種陰謀，憲兵官方文件中給它取個特別名稱，稱爲「特別運送品」。

證人前「滿洲國」陸軍憲兵隊日本顧問立花武夫供稱：「我管轄下的憲兵署特務處所審訊的一種人必須予以消滅。在這些人當中有極端仇視日本在滿洲當局的游擊隊員們。法庭並不對這些被捕的人開庭審判，因爲我們把他們送給七三一細菌部隊加以消滅。」另一證人前哈爾濱日本憲兵負責人的副官木村在審訊時供認：當七三一部隊長石井與哈爾濱憲兵署署長春日芳談話的時候，他也在

場，石井會表示相信將來他將和過去一樣繼續得到被捕的人作「試驗」。

蘇聯軍隊從滿洲的日本檔案中所繳獲的日本憲兵署的官方文件證實：自從一九三九年起，就有所謂「特別運送」俘虜的事。特別是關東軍憲兵司令城倉少將關於一九三九年將三十名俘虜「特別運送」至石井部隊去的第二四號命令。

被告川島清的供狀，表明了大規模消滅俘虜的事實：

「每年有五百到六百俘虜被帶到七三一部隊，我見過七三一部隊的第一處人員如何從憲兵隊那裏一羣一羣地收到這些人。」「根據我在該部隊工作所了解的情報，我可以說，由於實驗，每年總不下六百人死於七三一部隊。」「在七三一部隊駐紮於平房（譯音）東站的五年期間，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由於通過這個殺人工廠的致命細菌的傳染而殺害的不下三千人。在一九四〇年前，被消滅的人數我不知道。」

在一百號部隊中也犯有類似的罪行，該部隊第二處第六科專門用活人作實驗。

該部隊的實驗室工作者證人煙木秋露陳述該部隊的活動時稱：「關東軍一百號部隊號稱牲畜傳染病部隊，但實際上它是細菌部隊，因為它傳播和散佈鼻疽、炭疽熱及助長牲畜傳染病的畜類瘟疫細菌。一百號部隊中以對於家畜和活人的實驗來試驗細菌的性能，因此該部隊有馬匹、乳牛及其他動物，而且也有隔離起來的活人，因為我親自看見過，我才知道有活人。」

另一個在一百號部隊中當過獸醫的證人福積供認：「一百號部隊因為是一個實驗部隊，它的人員有科學工作者、細菌學家、化學家、獸醫及農業學家。這個部隊中所進行的全部工作的目的是準備多樣性的對蘇細菌戰爭。這個部隊的本部及其分隊都從事科學研究，尋求為大批毀滅獸類和人類而大規模使用細菌和烈性毒藥的方法。」「爲了確定這些毒藥性能的效果，就以動物和活人進行實驗。」

在一百號部隊任職的被告三友供稱，他親自用俘虜作非人性的實驗，殺死許多俘虜。

三友供稱：「有下面的一個例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的兩個星期當中，對一個俄國人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他的身體已經很消瘦，松井指示用注射精化鉀的方法把這個俄國人殺死。俄國人在注射後立即死亡，我是在軍人禁閉室進行注射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憲兵當着我面前在牲畜掩埋場槍斃了兩名俄國人，這兩個人就埋在那裏。他們是按照中島中尉的指示槍斃的，槍斃他們是因爲鑑於他們的瘦弱，和不適於作進一步實驗，而再不能拿他們進行實驗的緣故。」

除了以鼠疫和其他烈性傳染病進行傳染俘虜的罪惡實驗之外，七三一部隊廣泛進行冰凍活人四肢的非人性實驗，強迫俘虜把他們的手和腳放在特製的冰箱裏，直到四肢凍傷爲止。

證人古市供稱：「成羣的俄國人、中國人及蒙古人，數目從兩個人到十六個人不等，上了腳鍊，被帶到露天裏，用武器威脅他們，強迫他們把光着的手（有時一隻手，有時兩隻手）放進水桶裏，然後逼着他們把顯著的手露着，凍十分鐘到兩小時不等，看天氣的溫度而定，到他們被凍壞了的時候，再帶回監獄的實驗室。」

這些罪惡的實驗大都以受這種實驗的人的四肢爛掉和死亡來結束。這些實驗的目的是在計劃中的對蘇軍事行動期間，尋求防止四肢凍壞的辦法。

對中國戰爭中細菌武器的使用

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準備大規模的細菌戰，同時在他們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已經在一九四〇年部分地使用細菌武器。

在一九四〇年夏天，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將軍率領的特別細菌派遣隊會被派至華中戰區。在寧波地區，七三一部隊的飛機利用跳蚤把鼠疫散佈到敵人地區，那裏因此發生了流行性鼠疫。

被告唐澤關於上述派遣遺隊的組織情況供認：「在一九四〇年的下半年，我從我的直接上司鈴木少校那裏得到準備七十公斤傷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亂菌的命令。鈴木少校向我解釋這樣作的原因說，他奉部隊長石井將軍的命令製造細菌。石井當時正準備佈置該部隊的特別派遣隊使用細菌對中國軍隊作戰，我執行了這項命令。同時因為第二處的人員告訴我，我知道第二處爲石井將軍的派遣隊培養了五公斤跳蚤，作爲鼠疫的散佈者散佈這種傳染病。在一九四〇年九月，石井將軍曾與該部隊一批軍官同去漢口，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返回。與石井將軍同往漢口的軍官們返回部隊時說，利用跳蚤散佈傳染病產生了積極效果。由於跳蚤的散佈，發生了流行性傳染病。參加這個派遣隊的野崎少校把一份中文報紙指給我作爲證明，那張報紙登載着一篇論文說，黑死病在寧波城區發生。論文作者繼而達到了正確的結論：日本人對此次鼠疫的發生是要負責任的，因爲目擊者曾看見日本飛機在這塊地區盤旋並且低空投下一些東西。我親自讀過上面這篇文章。」

被告西豐彥曾親自看到過描寫在七三一部隊中，與中國軍隊作戰的日本細菌部隊之活動的秘藏新聞片，他供稱：「銀幕出現了下面這幾個鏡頭，有些特殊的器皿繫在飛機上，上有說明書稱：內有帶着鼠疫病菌的跳蚤。鏡頭是飛機在敵方上空飛行時攝下的，可以看見地面上中國軍隊某些運動和一片居民區。」西豐彥繼而供稱：銀幕上映出真正的細菌進攻和任務完成的情形：「飛機回到機場，接着是「任務達成」的字樣。石井從飛機上下來，下一個標題是「結果」。銀幕照出中國報紙及其日文譯文。中國報紙上寫着嚴重的、傳染性的鼠疫突然在寧波地區發生。」

除被告唐澤和西豐彥的上述供狀外，在日本關東軍檔案中所發現的文件證實了往華中戰區運送特別派遣隊的事實。特別是發現了前日本陸軍司令梅津大將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兵字第六百五十九號命令；他命令關東軍鐵路部隊司令將七三一部隊之一隊人員和特種機密的貨物運至華中。

此外還搜獲關東軍一七八鐵道部隊長於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所發出的關於執行上述命令的命

令。這個命令強調這次運輸的特別秘密，因此建議不要把它列入班次，並且指出平房、哈爾濱、瀋陽、上海、固安和天津的運輸路線。

一九四一年，七三一部隊遠征華中的常德地區。在這次遠征中，日機在該地區散放傳染性鼠疫的跳蚤。

一九四二年，當日軍從華中某激戰地區撤退時，七三一部隊又組織了一次遠征。

被告唐澤對於準備此次遠征一事供稱：「在石井將軍統率下的對中國軍隊的遠征，是在一九四二年中進行的。在鈴木少校命令之下，我在此次遠征之前監督準備了一百三十公斤的副傷寒和炭疽熱的細菌。據我所悉，在此次遠征中也使用了作為傳染病媒介的跳蚤。石井將軍及其部隊開往華中從事遠征，當時的華中日軍正在撤退。這一遠征派遣隊的人員利用軍隊的撤退，便在棄守的地區散佈細菌，旨在使前進的中國軍隊染上傳染病。」

另一個被告川島清完全證實了唐澤的供詞：「一九四二年七月，在進行初步準備之後，派遣隊即分成數隊赴華中……。」這一次的細菌武器是在陸上使用的，這一個地區被按照秘密破壞活動的原則，散佈了病菌，「前進的中國軍隊進入傳染區而且受到細菌武器的打擊」。

正如證人日本第三十軍軍部情報處處長高雪的證據所證明的一樣，細菌部隊「A」隊的隊員也參加了此次活動。

加緊準備對蘇的細菌戰

一九四一年，在希特勒對蘇發動背信棄義的進攻之後，那些正在等待時機來參加對蘇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積極地在滿洲組織和準備細菌部隊及其支隊，以便發動細菌戰爭。

按照「關東軍計劃」（即一九四一年夏季採取的部署日本關東軍以進攻蘇聯的計劃），七三一

部隊和一百號部隊組織了軍官和下級軍官，掌握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特殊訓練。

前關東軍獸醫部門負責人高橋高篤供稱：「自擬製了關東軍的作戰計劃之後，駐在滿洲的每一支軍隊的總部，都組織了「牲畜流行病」部隊。從一百號部隊派來的醫生和細菌專家，就是這些部隊的負責人。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第一作戰處，就是建立這些部隊的主管人。「牲畜流行病」部隊的任務，是準備和發動對蘇的細菌戰和牽制活動。」

被告川島清就日本加緊準備細菌戰一事供稱：「一九四一年夏季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後，我曾數度訪問石井將軍，有一次是有該部的負責人村上中校和大谷明上校在場的。那時石井將軍力言加緊部隊工作的重要性，並對我們宣讀日本參謀總長的命令。日本參謀總長要求加緊研究作爲細菌戰武器的鼠疫菌。該項命令特別強調有必要大量飼養跳蚤，以散佈鼠疫。」

被告前七三一部隊教育處長西豐彥談日本準備在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時進行細菌戰的情形，他供稱：「希特勒德國在一九四一年進攻蘇聯，駐在滿洲的關東軍集中於蘇聯邊境，爲建立細菌襲擊的有效工具的科學研究，大體已由七三一部隊所完成。這個部隊的進一步活動，是改進大量生產細菌和散佈細菌的方法。經實驗證明：鼠疫細菌是最有效的進攻手段。」

七三一及一百號部隊曾於一九四二年特別偵察蘇聯邊境地區，以準備進行細菌戰爭。更早以前，一百號部隊奉日本關東軍總部命令，有系統地派遣了細菌小組至蘇聯邊境。這種小組若干年來爲陰謀破壞起見，散放細菌於邊境的蓄水池。這些事實業已爲被告平櫻、三友，和證人川島及其他人的供詞所證明。

一百號部隊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在七三一部隊於安達站地區的靶場，在關東軍總部前代表們參加之下，舉行了所謂演習，試驗細菌武器的效果。參加此次演習的、證人福住作證稱：「關於尋覓大量使用細菌的方法，是使用特別器械和飛機在特別靶場進行的。這種試驗如在大規模進行時，

就叫做「演習」。這種「演習」於一九四四年九月間在安達站舉行過，試驗是以二百隻牛羊爲目標。這種試驗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因爲所有牲畜都染上了病，死了。關東軍總部的代表們曾坐飛機前來參觀這個試驗。」

七三一部隊、一百號部隊、及其支隊在準備對蘇聯的細菌戰爭上所特別加緊進行的活動，早在一九四五年即已開始。

被告西登彥曾就此點供稱：「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我親自向石井將軍作報告時，他特別強調加緊進行細菌培養工作的需要。首先是鼠疫細菌，因爲據他看來，情勢在發展着，隨時都可能有以細菌襲擊敵人的需要。」

爲了執行這種訓令，七三一部隊的所有支隊，加緊進行大規模捕捉與飼養啮齒動物（大老鼠小耗子）的工作，以便散佈染有鼠疫的跳蚤。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在分隊和軍事部隊中都成立了特別小組。

在同一時期，實驗的工作加緊了，裝備更換了，以便增加細菌的生產量和儲存量。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山田於被問及在他指揮下的細菌部隊的生產潛能時，他承認：這種細菌部隊的效能是極爲巨大的，僅七三一部隊就足以在必要時供應日本在細菌戰中所需的武器。

蘇聯及其武裝部隊挫敗了帝國主義日本的統治集團發動細菌戰爭的罪惡計劃。

蘇聯部隊進入滿洲境予敵人以迅速的使其癱瘓的打擊，在短期內就把日軍主力部隊關東軍擊潰了，同時迫使帝國主義日本無條件投降。被告山田供稱：「蘇聯對日作戰和蘇軍迅速深入滿洲，使我們用細菌武器與蘇聯和其他國家作戰的可能性被剝奪了。」

在投降的前夕，爲了消滅罪跡，日本就命令他們把細菌部隊及所屬支隊的建築、裝備和文件，統統銷毀了。

這樣，初步的調查就證實了日本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司令指揮之下的七三一和一百號細菌部隊的實際活動，是帝國主義日本統治集團的罪惡陰謀總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時下一事實亦已證實：日本軍閥爲了達成其罪惡的目的，不惜進行任何罪行，甚至以活人作此種不人道的實驗品，數千囚犯因爲強迫注射致命的細菌而被消滅。

被告個人的罪行

在本案中每一被告的罪行，具體表現在下列事實上：

一、山田乙三，自一九四四年以迄日軍投降爲止，任日本關東軍總司令，他指導七三一和第一百號特種部隊準備細菌戰爭。在任內，山田個人和其屬下負責軍官及該特種部隊的視察人員，曾不斷接到該部隊各指揮官的報告，並盡一切方法使該部隊經常處於準備狀態中。

被告山田由於親自視察和接到細菌部隊指揮官的報告，他是知道以活人作此種罪惡實驗的，他並鼓勵這種暴行。因此山田是要對因注射致命的細菌而死的數以千計的人民的野蠻屠殺負責的。

被告山田於敘述他對七三一部隊所起的領導作用時說：『因爲我是關東軍總司令，所以七三一部隊直接由我指揮。關於一切細菌武器的生產和使用，七三一部隊在戰術上都是由我領導。這就意味着：假如需要使用細菌武器來對付敵軍的話，那麼，這個命令就只能由我發出，因爲七三一部隊是由我指揮的特種部隊。』

一百號細菌部隊也是由被告山田指揮的。

二、梶塚龍二，自從一九三九年充任關東軍醫務局局長以來，便直接指導七三一部隊的工作，就是從事於準備細菌戰爭。梶塚是研究運用細菌武器之方法的一個創始人。

遠在一九三一年，梶塚便積極支持一個細菌戰爭理論家石井四郎，石井並應梶塚之邀，而爲職

爭目的加緊研究細菌武器的。一九三四至三六年，在主持日本陸軍部醫務局的時候，被告梶塚和個別專家積極參與七三一部隊的組織與參謀工作，並特別爲石井說項，使被任命爲七三一部隊的首長。

在審問時，被告梶塚完全承認他曉得七三一部隊及其各支隊的全盤活動——從以活人作罪惡的實驗以至使用細菌武器。

被告梶塚龍二供稱：「我確知用活人做試驗是時常在七三一部隊中進行，其目的在找出一種最有效的細菌武器；我知道七三一部隊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曾將細菌武器施之於中國軍隊與和平的老百姓，我所領導的軍隊醫療衛生隊已經爲細菌戰爭做好準備。」

梶塚龍二否認他本人曾參加準備對蘇聯細菌戰的直接實際活動，但是他已完全爲被告山田、高橋之供狀和證人川野等人的供詞所暴露出來了。

三、高橋高篤，自一九四一年至日本投降時任日本關東軍獸醫處處長，並直接領導第一百號部隊的活動，曾積極參加細菌戰爭之準備工作。

談及他在第一百號部隊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時，被告高橋高篤供稱：「我指導細菌戰爭和對蘇聯細菌牽制戰的準備工作。」「我在第一百號部隊中，命令準備並管理製造鼻疽和炭疽熱細菌，牛痘疫苗和斑駁病的細菌，以便把它們用於細菌戰爭和對蘇聯細菌牽制戰。」

指導一百號部隊工作的被告高橋高篤，經常力言細菌武器是一種最有效的戰爭工具。

四、川島清，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任七三一部隊生產處處長，並組織大規模的細菌武器的生產。被告川島清親自參加該部隊所大肆進行的罪惡的「研究」和在活人身上的「試驗」。

被告川島清對此問題供稱：「我認識到我們用活人作試驗的方法——整批地把他們用毒菌殺死——是野蠻的，並且是違反人道的罪惡。」

被告川島清在一九四二年參加了爲派往中國華中戰場的特別派遣軍準備作戰武器的工作，以便在華中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

五、西豐彥，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任七三一部隊六七三支隊隊長，他指揮他所率領的支隊的全部工作，爲七三一部隊準備製造細菌武器的必要材料。自一九四四年七月起，被告西豐彥兼任七三一部隊的所謂教練處處長，會親身參加用活人作罪惡的慘無人道的試驗。

當一九四五年蘇聯的勝利已經逼近時，被告西豐彥爲了隱蔽他罪惡行爲的痕跡，燒毀了一切他所領導的六七三支隊的房舍和檔案。

六、唐澤富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七三一部隊生產處的科長，他是大規模製造細菌武器的一位積極組織者。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被告唐澤參加了爲七三一部隊華中特別派遣隊供應細菌的工作，以便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唐澤直接參加用俘虜試驗致命的細菌的罪惡實驗。

七、尾上正雄，從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任七三一部隊的六四三支隊隊長，直接指導廣泛的調查最爲有效的作戰細菌武器和大規模製造的方法。

被告尾上供稱：「我知道七三一部隊是從事研究與大規模製造細菌的工作，以對蘇聯進行細菌戰。在我所領導的六四三支隊中培養着嚙齒動物和帶鼠疫的跳蚤，並將它們送給七三一部隊，在那裏它們被用來準備細菌武器。」

支隊訓練處在被告尾上的領導下，曾有系統地準備了從事細菌戰的專門人才。一九四五年，爲了掩蓋他所作的準備細菌戰的罪行，尾上銷毀了支隊的一切設備與檔案。

八、佐藤春二，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任「波」「榮」部隊的司令，而自一九四四年起，即任第五軍（關東軍的一部分）的醫務處長，他領導七三一部隊的六四三支隊的活動。

領導「波」、「榮」部隊的被告佐藤，是積極從事研究與製造細菌武器的。後來任第五軍醫務處長的被告佐藤，給予六四三支隊以積極的援助和支持，這表現在增加細菌生產，和向第五軍發備爲這一支隊收集啮齒動物的特別命令。

當質詢時，被告佐藤供稱：「我任「榮」部隊的司令，領導部隊研究和大規模生產細菌武器。爲了這個目的，南京「榮」部隊裝備了有力的設備，配備了細菌學專家，並製造出大規模的致命的細菌。訓練處在我的領導下，每年準備了三百名的細菌學家，目的在於細菌戰爭中使用它們。」

除了他自己的供狀之外，被告尾上、證人川島和其他人的供狀，也證實佐藤的罪狀。

九、平櫻著作，一九四二年七月至日本投降時爲一百號部隊的雇員，而且在研究與大量生產用於進攻蘇聯的細菌武器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被告平櫻領導一百號部隊人員組成的偵探組，曾一再參加反蘇的特別偵察工作，旨在尋求最有效的使用反蘇的細菌武器的方法。在同一時期內，他抱着破壞的目的，一再於蘇聯邊境，特別在特里列奇區內的蓄水池中放毒。

十、三友勝雄，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任一百號部隊之一員，在爲從事細菌戰爭和進行反蘇破壞而生產致命的細菌上起了積極作用。

三友會親自極端殘酷地殺害犯人，在他們身上試用過某種類型的細菌武器。

在一九四二年七、八月內，被告三友作爲一百號部隊偵探組之一員，曾參加在特里列奇區的反蘇破壞活動。

十一、菊池乘三，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內充當士兵。菊池從一九四四年二月至一九四五年二月爲該支隊第一處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並從事培養傷寒與赤痢菌，幫助了細菌武器的研究工作。菊池於一九四五年六月於七三一部隊（細菌武器人員在該隊內受

訓)細菌訓練班重新受訓。

這是菊池本人的供詞和證人齋藤、岡田水繁等人的證言所證實的。

十二、久留島重治，一九四四年十月受特別訓練後，在七三一部隊的一六二支隊內服務，並在支隊的第一處內充任護士和實驗室工作人員，參加了培養霍亂、傷寒等等細菌的工作。久留島供認，他知道七三一部隊已經在準備細菌戰並且已經在製造細菌武器。

作爲被告而受審的山田乙三、高橋高篤、唐澤富雄、川島清、尾上正雄、西豐彥、平櫻善作、佐藤春二、三友勝雄、菊池乘三及久留島重治十一人，對於向他們所提出的一切罪狀，都表示服罪。被告堀塚龍二則承認一部分罪狀。

除了親自供認外，本案各被告的罪狀均由許多證人的證言、書面證據及法醫專家委員會的研究結論，加以證明而成立。

根據以上所述，特將下列各犯提出公訴：一，山田乙三，一八八一年生，籍貫東京，陸軍上將，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二，堀塚龍二，一八八八年生，籍貫多治見，醫生兼細菌學家，中將醫官，前日本關東軍醫務局局長；三，高橋高篤，一八八八年生，籍貫秋田縣，化學家兼生物學家，中將獸醫官，前日本關東軍獸醫局局長；四，川島清，一八九三年生，籍貫千葉縣，醫生兼細菌學家，少將醫官，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生產處處長；五，西豐彥，一九〇四年生，籍貫鹿兒島，醫生兼細菌學家，中校醫官，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教練處處長；六，唐澤富雄，一九一一年生，籍貫長野縣，醫生兼細菌學家，少校醫官，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製造處科長；七，尾上正雄，一九一〇年生，籍貫鹿兒島，醫生兼細菌學家，少校醫官，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長；八，佐藤春二，一八九六年生，籍貫愛知縣，醫生兼細菌學家，少將醫官，前日本關東軍第五軍軍醫處長；九，平櫻善作，一九一六年生，籍貫良川縣，前日本關東軍一百號部隊中尉獸醫官；

十，三友勝雄，一九二四年生，籍貫埼玉縣，前日本關東軍一百號部隊上士；十一，菊池乘三，一九二二年生，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醫務士兼實驗士；十二，久留島重治，一九二三年生，籍貫小川縣，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一六二支隊醫務士兼實驗士。

在日軍中担任高級職位之山田、梶塚、高橋及佐藤四人，被控領導日軍細菌特種部隊的活動並指揮其從事製造細菌武器，目的在於準備對蘇聯及對其他國家的細菌戰。這四名被告因而積極參加了實現帝國主義日本的統治集團發動侵略戰爭，並準備大批屠殺和平居民的細菌武器的計劃。

被告山田、梶塚及高橋三人並且有意識地准許對活人進行罪惡及慘無人道的實驗，其結果，慘遭殺害者不下三千餘人。被告佐藤，指揮「波」「榮」部隊，並親自領導其製造細菌武器。

山田、梶塚、高橋及佐藤四人的犯罪活動，已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命令第一條成立。

專事準備與進行細菌戰的日軍細菌特種部隊的負責人員川島、唐澤、西豐彦、尾上及平櫻五人，被控參加研究與製造大批屠殺人民的細菌武器。被告川島及唐澤兩人參與進行對華細菌戰，平櫻參與對蘇的細菌破壞活動。

川島、唐澤及西豐彦三人並親自參與對活人的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

他們的犯罪活動已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命令第一條成立。

爲準備與進行細菌戰而成立的日軍細菌特種部隊的人員三友、菊池及久留島三人，被控參與這種爲製造大批屠殺人類的細菌武器而成立的特種部隊的犯罪活動。三友並親自參與以慘無人道的實驗手段，進行卑鄙的殺人行爲，並親自參與對蘇的細菌破壞活動。

這些罪狀已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命令第一條成立。

上述各被告均應受軍事法庭審判。

濱海軍區軍事檢察官上校軍法官畢列左夫斯基（簽字）

〔新華社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消息〕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細菌戰犯案詳情

一 審訊各被告

前日本陸軍軍人山田乙三、梶塚龍二、高橋高篤、川島清、西豐彥、唐澤富雄、尾上正雄、佐藤春二、平櫻善作、三友勝雄、菊池乘三及久留島重治十二人，被控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一案的審判，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伯力時間正午開始，罪狀係依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國命令的第一條成立。

本案係由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法庭由審判長少將軍法官契爾特科夫、審判員上校軍法官伊里伊茨基和審判員中校軍法官沃羅比耶夫組成。國家檢察機關方面，由第三級國家法律顧問斯米爾諾夫協助工作。被告辯護律師有波羅維克、別洛夫、山尼科夫、茲維列夫、波加切夫、普羅科朋科、魯克揚榮夫及波柯維蒂諾夫等八人。

旁聽席滿座，到庭旁聽的有伯力各大小工廠的工人、職員、科學家及蘇軍代表。早晨開庭時首先宣讀起訴書。各被告對於被控的罪狀均當庭服罪。

審訊被告川島清

下午庭審問被告川島清——細菌武器的研究、製造和使用的直接積極參與者之一。受過訓練的

細菌學家、醫學博士川島，曾先後領導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的一切最重要部門達數年之久，並親自參與該部隊對成批活人進行的多次罪惡「研究」和「實驗」。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他參與組織特別遠征隊，赴中國的華中戰場使用細菌武器作戰。

川島供認：七三一部隊在一九三六年奉日本天皇裕仁的命令組成的。被告說：「據我們記憶所及，一九四〇年頒佈的天皇秘令，規定七三一部隊的名額為三千人。該部隊人員的絕大多數是專家——細菌學家和在細菌學上受過一定訓練的人。依照關東軍總司令的命令，該部隊駐紮的地區被宣佈為禁區，甚至飛機都不准飛越該區上空。日本當局撥出大量基金，維持七三一部隊。在一九四〇年就撥款一千萬日元，其中指定用五百萬日元作實際工作。」

川島回答檢察官的質問時稱：七三一部隊的機構有八個處。第一處是準備細菌武器中的主要研究部門，並從事活人實驗。在七三一部隊大廈廣場的中央有一座在外面看不見的特別監獄，用來關閉中國愛國者和蘇聯人，在他們身上強迫施行致命的細菌的實驗，其中有婦女，有的還帶着嬰兒。在該隊的地區內，除監獄外還有火葬場，被虐殺的人們的屍體，就在那裏焚毀。如果染上細菌的人未死，他就會反覆受實驗，一直到他被投到火葬爐裏。

檢察官：「這是否就是說，凡是關進七三一部隊監獄裏的人，都非死在那裏不可呢？」

川島：「是的，是這樣。」

在五年中，在該部隊的監獄裏因強使傳染致死的細菌而痛楚死去的人，約有三千名。

七三一部隊的第二處作致死的細菌的野外實驗。第二處會實驗各種細菌武器——裝有傳染細菌的炸彈和鼠疫跳蚤散播器等。第二處有一個專門繁殖跳蚤的部門，該處在安達（按在黑龍江省）站附近有它自己的靶場和它自己的飛機。

川島以無恥的滿不在乎的態度，描述裝有鼠疫跳蚤的炸彈，如何在打靶場活人身上實驗的情

形。例如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把該部隊監獄裏的十五個人，由飛機帶到這個靶場上。他們被綁在鐵柱上，然後從飛機上將裝有鼠疫跳蚤的陶瓷炸彈投在靶場上。被告供稱：「執行這件事情的大谷大佐對於這次實驗中的人們沒有完全死光，引為遺憾。」

細菌彈的陶瓷彈殼是七三一部隊第三處製造的。

川島供稱：該隊第四處的主要職務是為細菌戰而大規模繁殖和培養細菌。

此外，在七三一部隊的管轄下還有四個支隊，設在蘇滿邊境的附近——在林口、海林（按在松江省）站，蘇尼夫及海拉爾（按在內蒙古自治區）。

檢察官：「因此，你是否證實你的供詞，說這些支隊在對蘇戰爭一旦爆發時，將是使用細菌武器的幾個支柱，並且這些支隊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被派到直接毗連蘇聯的地區呢？」

川島：「對的，是這樣。」

被告供認在法西斯德國對蘇聯開戰之後，七三一部隊的活動特別緊張。

一九四一年夏季，七三一部隊隊長石井四郎中將召集該部各處處長舉行特別會議，並通知他們說，他已收到日軍參謀總長關於加緊準備細菌戰爭的各種訓令。石井特別指定要完成在一定期間之內培植二百公斤的跳蚤這一任務。

以川島為首的第四處的工作也擴大了。該處的產量因此增至每月生產三百公斤鼠疫菌，或八百至九百公斤傷寒菌，或五百至七百公斤炭疽熱病菌，或一噸霍亂菌。

川島接著詳細描述培養致死的細菌的技術。他進一步供認在中國的華中及華南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並因此組織了特別遠征隊。一九四一年夏季，日機在常德地區散發傳染鼠疫的跳蚤，於是鼠疫便在和平的人民中開始流行。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軍參謀本部命令第二遠征隊開往中國，該隊的主要目的是根據破壞活動的

原則在該地散佈傳染性的細菌。在這次活動中，傳染鼠疫的跳蚤是從飛機投散的，而霍亂菌、副傷寒菌，和炭疽熱菌，通過蓄水池、井、河道和其他媒介傳播。

檢察官：「告訴我們，爲什麼細菌戰爭的準備，在滿洲進行而不在日本進行呢？」

川島：「因爲滿洲是鄰近蘇聯的國家，而且在對蘇戰爭一旦爆發時，從滿洲拿出細菌武器使用是較爲容易較爲便利的。此外，滿洲又是很適宜進行試驗細菌武器的實驗的。」

檢察官：「有什麼便利呢？」

川島：「滿洲有廣大的領土。再者，滿洲有足量的實驗材料。」

檢察官：「什麼是實驗材料？是不是那些被憲兵隊逮捕並被送到七三一部隊的監獄裏的人民呢？」

川島：「正是這些。」

檢察官：「作爲一個細菌學專家，你是否懂得使用細菌武器，不僅使交戰國受到威脅，而且也使中立國受到可怖災禍的威脅呢？」

川島：「是的，我明白這一點。」

審問被告川島後，下午庭於是結束。

審訊被告唐澤富雄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開庭，首先審訊被告唐澤富雄，他是七三一部隊生產處的科長。該處處長是被告川島清。

唐澤出身醫生兼細菌學家，它是大批製造細菌武器的積極組織者之一。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被告會親身參與以細菌供給華中特別派遣軍，以便在作戰中使用細菌武器。一九四三——一九四

九四四年，他直接參與以致死的細菌在囚犯身上作罪惡的實驗。

被告曾在七三一部隊中服役五年。最初他是一個下級的人員；隨後，由於在大批生產細菌武器和屠殺人民方面的「熱心」，逐漸擢升到科長的職位。

被告證實，在七三一部隊裏，曾在實驗室的和野地這兩種不同的環境下，對成批活人作大規模的實驗。他繼供稱，在他所領導的科裏，共有兩套大批生產細菌的設備，每一套都有六個鍋爐，製造培養細菌的培養劑。鍋爐的總容量是八噸。此外還有其他大批製造細菌武器所需要的設備，包括石井四郎所發明的「孵育器」，這種孵育器以此被稱爲「石井式孵育器」。唐澤以大批生產的規模製造出來的致死細菌，是被用作對付中國人民的細菌武器，同時也用來在活人身上作實驗。

被告唐澤繼供稱，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七三一部隊的設備有頗大一部分被分散到各支隊去。這一方面是為了儘量避免因可能的轟炸而使七三一部隊的製造能力受損失，另一方面是爲了加大生產戰爭的細菌武器的能力。

爲了確定美國軍隊對各種作戰用細菌的感染程度，七三一部隊的人員在美軍戰俘身上研究了對各種傳染病的感受程度。

唐澤答覆國家檢察官的問題，供稱：「一九四三年年初，當我在瀋陽醫院裏臥病時，七三一部隊的科學工作人員一個姓溙的來看我。他告訴我說：「在瀋陽，正研究美軍戰俘對傳染疾病的免疫性。」

「姓溙的是七三一部隊特別派到戰俘營研究盎格魯薩克遜人種對傳染性疾病的免疫性的。」

檢察官：「是否預見到用細菌武器對付美國的遠景？」

唐澤：「正是這樣。預見到這個遠景的。」

被告繼招供他在安達站親自參加實驗，以確定炭疽熱病在交戰地點活人身上的活動狀況。當時

曾用電流使爆裂彈爆炸，以便使綁在柱子上的活人受到傳染，結果，很大一部分人受到炭疽熱病的傳染，他們又被帶回到第七三一部隊的監獄裏。他們絕大多數幾乎都在那裏死掉了。被告也敘述了關於他那科所培養的鼠疫細菌活動的實驗。

唐澤回答檢察官的問題，供認了七三一部隊派赴中國本部的特別派遣軍的活動，他曾積極參與派遣軍的準備工作。一九四〇年九月，這支由石井四郎中將醫官率領的派遣軍到了杭州地區，在寧波城附近實地應用細菌武器。以後不久，寧波就鼠疫流行。唐澤又供稱，在一九四二年，也曾有同樣的派遣軍派到中國本部。

法庭繼續審訊被告山田。

審訊被告山田乙三

山田乙三在日本陸軍裏，曾担任若干很重要的職位。一九三八年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他是華中日本派遣軍（總部設南京）司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他是日本陸軍訓練總監，同時又是最高軍事會議委員，有一個時期還担任過日本防衛總司令官。從一九四四年七月直到向蘇軍投降時為止，他是關東軍司令。

關東軍司令任內，山田親自監督並通過其部屬員監督細菌戰爭的準備工作。他曾屢次聽取七三一、一百號兩特種部隊的首腦的報告，並曾採取一切措施使這兩部隊能處於隨時能出動作戰的狀態並能够大規模製造和使用細菌武器。

山田供稱：在他擔任關東軍總司令時，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受他直接統轄，這兩部隊的活動極爲秘密。在山田就任關東軍總司令後頭幾天，就聽取了現在坐在罪犯席上的梶塚將軍和高橋將軍的報告，他們向他作關於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準備細菌戰的工作進展的報告。以後不久，山田

親自前往視察七三一部隊，如他所說，當時他爲已經製成的跳蚤的數量之巨大和該部隊大量製造細菌武器的能力所驚訝。

被告稱：「我相信七三一部隊的生產能力足以供應在大規模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

在答覆國家檢察官的問題時，山田供認細菌武器主要是設計來對付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然而也有意用來對付美國和英國。

山田繼而供稱：一九四五年三月，關東軍司令部收到日本軍部關於增加細菌武器的生產的訓令。爲執行這一命令，他採取了爲七三一部隊配備專家和增加裝備的措施。他並訓令一百號部隊司令部加強在與蘇聯接壤地區的細菌偵察。

檢察官向被告山田提出一宗在與蘇聯接壤地區進行細菌偵察的一百號部隊特別組的工作報告的攝影副本。山田供認會進行此種偵察及類似的偵察，以準備反蘇戰爭。

在法庭訊問的過程中，被告山田繼而供稱：「關東軍會進行研究利用細菌武器的最有效的方法。由參謀長、軍事戰略參謀處長、各細菌部隊的長官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對這些方法加以討論。關於細菌武器的各種類型以及關於被認爲是最有效的使用方法，均曾報告日本陸軍參謀長。」

日本軍國主義者可怕的罪惡陰謀的計劃在審訊過程中愈來愈顯著地透露出來。應國家檢察官之請，法庭宣讀了所謂「對破壞活動組的作戰命令」；該項命令係日本陸軍參謀長和陸軍訓練總監於一九四四年一月發佈，當時山田任陸軍訓練總監。這個「命令」中的一節曾提出關於爲破壞目的利用細菌武器的方法的指示。

檢察官：「被告山田，這個「命令」是由你所統轄的軍事訓練總監部擬出的嗎？」山田：「是，這些「命令」是由軍事訓練總監部和參謀部共同擬出的。」

檢察官：「這是說甚至在你被任命爲關東軍司令以前，你就參與細菌戰的準備？」山田：「是，是這樣的。」

山田繼而供稱：他個人贊成石井式炸彈，從飛機上噴射細菌以及在陸地上進行細菌破壞活動，是使用細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

在審訊過程中，公佈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犯下可怖的罪惡——準備細菌戰爭。在法庭上宣讀了所謂「戰俘審訊綱要」；其中規定戰俘中不僅有軍人，而且有和平公民。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發佈的這一文件聲稱：「在審訊中，使用酷刑時是有好處的。同時，實行酷刑時必須不發生對我們不利的影響……。在行刑後，要不留傷痕或創疤。」隨即舉出了酷刑的這幾種「簡單」方法：把鉛筆放在手指中間，用細繩把指尖捆住；讓受審的人仰天躺下（文件中建議把腿抬高一些），同時把水一滴一滴地倒進鼻子和口腔裏；把受審的人放在地板上，猛踏他的外腳踝骨等等。

繼而，法庭審訊又返回到七三一部隊的活動上，在這個部隊中，「有學識的」細菌學家把成千成千的人拷打至死。山田供稱，爲了試驗七三一部隊所製造的細菌武器的效能，就在實驗室與極近似作戰狀況的野地的狀況（他從他的下級方面得知這些情形）下，對活人進行實驗。然而，被告山田企圖減輕他的罪狀，他想使法庭相信在七三一部隊的監獄中殘酷地被虐殺的人，是已被判處死刑者。然而蘇軍在一九四五年在滿洲擊潰關東軍時繳獲的文件揭穿了他。在法庭宣讀的文件說明，在關東軍總司令的認可之下，由憲兵隊和軍事機關送往七三一部隊監獄的人是未經審訊和調查而被害死的，其中是些沒有犯過任何罪行而祇是不爲日本侵略者所喜的男子和婦女。

蘇聯及其武裝部隊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統治集團要發動細菌戰爭的罪惡的計劃。蘇軍在進入滿洲後，對敵人加以迅速的橫掃一切的打擊，在最短時間內粉碎了日本的主力——關東軍，並因而

迫使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山田繼而供稱：完全是因爲蘇聯軍隊的迅速的攻勢，才阻止了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的使用細菌武器。

審訊被告西豐彥

下午庭審訊被告西豐彥。自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他擔任七三一部隊六七三支隊隊長。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他兼任七三一部隊的所謂教練處處長，指導旨在用以進行細菌戰的特別分隊人員的訓練事宜。

西豐彥供認，他在任支隊長時會直接地積極地參與準備細菌武器的工作。在他的指導之下，有數十個人飼養跳蚤，從事繁殖嚙齒類動物。審訊證明：正如西豐彥本人所供認不諱的，他曾經訓練志願兵、士官、及參加七三一部隊的其他人員。

西豐彥並又以無恥的滿不在乎的態度敘述了大量製造致死細菌以及他本人參與對活人強制實驗的情形。西豐彥的供詞進一步揭露了七三一部隊驚人的兇惡活動；田中工程師設計了一種作爲破壞之用的特種手杖，這種手杖中裝着染有鼠疫的跳蚤；大戶大佐製造了一種「巧克力」，其中含有炭疽熱病細菌，作爲破壞之用。

西豐彥的供詞證明：一九四〇年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情形已攝成影片。西豐彥供稱：七三一部隊裏所放演的「科學」影片中，有一個影片是關於對高空室裏的活人所作的實驗。這個影片是從「受實驗」的犯人們所照出來的。

曾負責指導細菌戰人員訓練事宜的被告西豐彥，繼即敘述關於以活人實驗凍傷的情形。他們帶着腳鐐手銬被領出監獄，光着雙手。爲了加速使冰冷到極點，還使用人造風。他們又被迫把他們凍傷的雙手放在溫水中。這種程序的結果將由七三一部隊支隊的人員們加以「研究」。

西豐彥的供狀並證明了七三一部隊曾於哈爾新——葛爾專變期間，使用細菌武器：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間，當我自支隊調任七三一部隊教練處處長之職時，我在我的前任者的保險櫃中發現了證明在哈爾新——葛爾專使用細菌武器的文件。在這些文件中，有照片的底版和被處死的人名冊。」

至此，下午庭宣告結束。

審訊被告梶塚龍二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開庭審問被告梶塚龍二——前日本關東軍醫務局局長、中將醫官、醫學博士兼細菌學專家。梶塚直接領導七三一部隊的科學研究，這種工作是在於設法發現最有效的細菌武器並把這種武器在活人身上進行實驗，被告是研究如何使用細菌武器的倡導者之一，他積極支持石井四郎——首惡的日本細菌戰理想家——的要求，加緊研究用於作戰的細菌武器，梶塚積極參與組成七三一部隊並為七三一部隊配備適當的專家。

被告供認：七三一部隊係依照日本天皇裕仁的密令成立的，當時梶塚是日本陸軍省軍醫署署長，因此很了解這個部隊的計劃中的活動。被告承認，他曾參與為七三一部隊配備高度熟練的專家——細菌學家，他曾出力使石井四郎被委為該部隊長官。因為他與石井曾因共同研究細菌學而長時期交往甚密。

國家檢察官訊以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和陸軍省裏那些首要人員支持和贊同這種罪惡意見，梶塚答稱：「後來担任陸軍省總務長的野方中將和總參謀部第一戰略處處長鈴木上校等人最積極支持這種意見。石井四郎關於準備細菌戰的意見還得到前日本陸相荒木的支持，石井曾向荒木提出關於成立細菌部隊的計劃。」

檢察官：「七三一部隊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根據什麼決定成立的？」

梶塚：「七三一部隊是在一九三五年末或一九三六年初奉日本天皇的秘密勅令組成的。」

梶塚又供認：天皇裕仁發出過擴大和改編七三一部隊的勅令，前陸相東條也下過特別密令，命令加速執行天皇這個勅令。

被告說：該部隊在重編之前表面上稱爲「關東軍參謀部防疫局」，改編之後的名稱叫「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這個所謂局的人員會擴充到一千人。

檢察官：「爲什麼七三一部隊的所有支隊全都駐紮在蘇聯邊境非常近的地方呢？」

梶塚龍二：「準備隨時對蘇作戰。」

被告供稱：有一次他去訪問當時由石井四郎所統率的七三一部隊。

被告稱：「石井四郎已經擬出進行細菌戰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從飛機上散佈染有鼠疫的跳蚤和細菌、利用細菌炸彈以及進行破壞活動。他對我詳細說明這些方法。石井四郎繼而告訴我使菜蔬、水菓、魚、肉、及其他食品裏含有致死的細菌，並用這些食品來對活人做實驗的情形。石井四郎對我說，這些實驗得到「良好的結果」，就是說：人全死了。」

梶塚龍二繼而向法院說明七三一部隊如何在中國本部運用細菌武器。

梶塚龍二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稱：石井四郎部隊的人員曾去上海南部並且從飛機上往那裏散佈染有鼠疫的跳蚤。那次實驗證明是非常有效。

檢察官：「你的職業是醫生，對吧？」

梶塚龍二：「是的，檢察官。」

檢察官：「這樣說來，你身爲醫生，身爲一種人道的職業的代表者，竟以爲把無數染有鼠疫的跳蚤投向中國的和平居民只是一種實驗嗎？」

梶塚龍二：「當時的確以為是的，但是那是一種慘無人道的毒辣的行爲。」

被告梶塚龍二繼又供稱：當他任關東軍醫務局長時，他曾直接指導七三一部隊關於培養與利用致死的細菌以及凍傷效果等這些方面的「科學研究」。

在答覆檢察官訊問時，被告梶塚龍二供認七三一部隊曾在他的同意與認可之下來對凍傷的活人做「實驗」。

梶塚龍二供出七三一部隊的罪惡活動的詳細情況，企圖在審判前貶低他在準備細菌戰爭和對活人所做的那些暴行中所充任的角色。但是用山田及其他被告的供詞來向他質對時，他不得不完全承認他的罪狀。

繼之法庭開始審問被告佐藤春二。

審訊被告佐藤春二

少將醫官、醫學博士佐藤春二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曾任「波」部隊（廣州）和「榮」部隊（南京）長官，後來担任第五軍——日本關東軍之一部——醫務處長，他曾領導七三一部隊一個支隊的活動。

佐藤春二對於他是準備細菌戰的直接組織者之一的罪狀供認不諱。

被告供認：南京部隊的組織者和首任長官是著名的細菌戰思想家石井四郎，石井後來担任七三一部隊長官。南京部隊有十二個支隊，共一千五百人，其中有許多細菌學專家。表面上該部隊稱為防疫及供水局。但實際上，其大部分人員像在七三一部隊一樣，都從事細菌武器的準備工作。他們有特殊設備，每天能製造十公斤的致死的細菌。一羣「專家」曾從事大批培養跳蚤，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使用特殊的孵育器。這些跳蚤被用作散佈鼠疫菌的工具。

檢察官：「『榮』部隊培養跳蚤和鼠疫菌的情形如何？」

佐藤春二：「爲了培養跳蚤，『榮』支隊擁有一百架特殊的孵育器、細菌處有專門的一科從事培植鼠疫細菌的工作。」

被告佐藤稱：「『榮』部隊（以前稱爲『玉』部隊）是被派遣以細菌武器對付中國軍隊與和平居民的七三一部隊進行遠征的基地。

佐藤在一九四四年担任第五軍（關東軍的一部）的醫務處長，他當時積極地幫助六四三支隊增加細菌設備的產量。

佐藤然後又供稱：被告尾上（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長）曾要求他幫助增加細菌武器的產量。他需要老鼠等等的東西來繁殖跳蚤。佐藤通過第五軍的人員下令部隊捕捉老鼠送給六四三支隊。

檢察官：「被告佐藤，你所知道的關於『榮』部隊參加七三一部隊對中國人民的細菌戰的情形如何？」

佐藤：「一九四〇年在寧波城地區，一九四一年在常德城地區和一九四二年在華中戰役中都使用了細菌武器——把染有鼠疫的跳蚤自飛機上向下散播。『榮』部隊的某些人員在華中戰役中幫助七三一部隊。」

佐藤還被控對活人進行實驗之罪。他用種種遁辭來規避對這種暴行的責任，但是文件揭穿了他。法庭宣讀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訊速記記錄的若干段。

這一文件是由首席檢察官助理沙頓（美國）提交國際法庭，並被法庭接受爲證據。

佐藤親自承認：這個文件裏記載着『玉』部隊（也稱『榮』部隊）的暴行。這些暴行與七三一

部隊監獄中所進行的暴行一樣。

審訊被告平櫻善作

從一九四二年七月直到關東軍向蘇軍投降，平櫻善作一直是一百號部隊的負責長官。平櫻對法庭說：「一百號部隊爲了掩護其活動而稱爲關東軍獸類傳染病試驗局。而事實上，它主要從事準備細菌戰。該部隊的總部設在距長春數公里的孟家屯。該部隊通過獸醫局長被告高橋直接隸屬於關東軍。一百號部隊在大連，海拉爾等地設有支隊，每支隊設幾個組。後來海拉爾支隊又移到另外一個地方。一百號部隊總部的人員多達八百人。」

檢察官：「在細菌戰中主要利用什麼傳染病？」平櫻：「鼻疽病，牛瘟，及炭疽熱病。」

平櫻又向法庭敘述一百號部隊派到蘇聯邊境地區的派遣隊的情形，他曾親自參加這種派遣隊。平櫻在法庭上敘述一百號部隊對活人進行細菌實驗的情形。這些實驗由被告三友執行。

審訊被告高橋高篤

法庭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開庭時審訊被告高橋高篤中將獸醫官。從一九四一年直到日本投降，高橋一直担任關東軍獸醫局長。高橋直接指導一百號部隊的活動，並且極積極地參與準備細菌戰。他經常宣傳細菌武器是戰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被告高橋在法庭上供稱：「一百號部隊的任務是大規模製造細菌，作爲細菌戰及細菌破壞的手段。」

檢察官：「細菌戰是對什麼國家進行？」高橋答：「主要是對蘇聯。」

檢察官：「一百號部隊培植什麼細菌來用作細菌戰的武器？」高橋答：「炭疽熱，鼻疽病，斑駁病及牛瘟的細菌。」

檢察官：「一九四一年九月間誰命令一百號部隊長官若松將軍開始大規模製造細菌？」高橋答：「那時我是獸醫局長。直接由我以關東軍司令梅津將軍的名義下令。」

被告高橋繼而敘述一百號部隊的活動。他說：一百號部隊在沿蘇聯邊境的滿洲領土內有若干支隊，這些支隊是一百號部隊的前哨部隊。

高橋供稱：他曾親自採取措施，加速大批製造鼻疽病細菌及其他細菌。然後他說：一百號部隊曾有一批人員於一九四四年奉他的命令並且在關東軍第二課報處的同意之下前往北興安省收集關於在河流、水池、牧場及草原一帶的畜羣的情報。這個從事破壞活動的諜報組由被告平櫻領導。

檢察官：「這種偵察的最後目的是什麼？」高橋答稱：「目的是一旦日蘇發生戰爭的時候，一百號部隊能够使該省的所有牲畜都流行傳染病，並將它們趕向蘇軍的作戰地區。」

被告高橋在回答檢察官的問題時承認他本人負一百號部隊對活人進行細菌試驗的責任。法庭的下午庭並審訊了被告三友勝雄。

審訊被告三友勝雄

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日）下午審判庭上，最後向法庭招供的是被告三友勝雄，他從一九四一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是一百號部隊的一員，三友親自參加了用活人實驗各種細菌武器的效能，這種實驗結果使人痛苦地死去。在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間，他以一百號部隊破壞組一員的資格參加了特異列奇地區的反蘇破壞活動。

被告供認，他曾在一百號部隊第六處工作，該處有四個裝備良好的實驗室，進行研究及培養致命細菌工作，準備細菌戰爭。研究工作主要集中於獸類流行病，即培養鼻疽病、性畜黑死病和炭疽熱的細菌。每一個實驗室擁有十到十五個科學家和相當數目的技術人員。

被告：「我主要是作培養鼻疽病細菌的工作，也參加對活人的實驗。」

被告三友對法庭說，第六處對活人的實驗工作是由他和科學家飯田、中島中佐和實驗室助理松井來進行。要受實驗的人被從憲兵隊部或日本軍事代表團處帶來第六處，這些人被送入第六處的禁閉室，以後便取消他們的名字，而編成號數。三友又供認，他親自在「實驗」後用毒藥毒死過兩個俄國人，他也這樣處死過許多中國人。他的職務是處死那些不能再經受實驗的人和埋葬他們的屍體。

他又詳細描述一百號部隊出動特里列奇地區活動，他說，這次出動是由村本少校率領。被告平櫻也參加了。

檢察官：「這次出動的目的是什麼？」

三友：「這次出動——或者更精確的說，這些陰謀活動，目的是在研究，也是在使用鼻疽和炭疽熱細菌，對蘇聯進行破壞。這次出動的遠征隊在吉爾布耶河中放入鼻疽細菌，在貯水池的死水中則放入炭疽熱細菌。」

審訊被告尾上正雄

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四日）上午開庭時，開始審訊被告尾上正雄。他從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任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長，積極與直接地參加細菌武裝的準備工作，六四三支隊組織了大規模的跳蚤培養，用來傳染鼠疫，擁有大規模培養傳染病細菌的裝備。該支隊的所謂教練處，在尾上的監督下，有系統地訓練專門人員以備進行細菌戰爭。

尾上告訴法庭說，他的職業是醫生——細菌專家，從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他在東京軍醫學校受專門訓練，因而精通細菌學。一九四三年十月，被任命為駐在牡丹江城的六四三支隊的隊長。

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被告供稱：六四三支隊從事大規模孵育跳蚤和嚙齒類動物，以便用於細菌戰爭。該支隊擁有各種物資數十噸，可用以準備孵育細菌的培養液。該支隊有從事捕捉老鼠的特別派遣隊。這些嚙齒類動物即充作孵育跳蚤的工具。

被告繼而供稱，從一九四五年春天石井四郎再度担任七三一部隊長時起，他就要求擴大孵育跳蚤的規模，並送它們到七三一部隊去。

被告告訴法庭他很清楚七三一部隊用活人來做「實驗」。把鼠疫細菌和其他傳染病的細菌注射到他們的血液中，然後觀察病的進行和發展，直到人死亡時為止。被告還知道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的情形。他說，這些「實驗」害死了千百條性命。

審訊被告菊池乘三與久留島重治

法庭繼而審訊被告菊池乘三與久留島重治。兩人皆供認他們曾是擬進行細菌戰的部隊人員，他們承認，他們在這些部隊中工作幫助準備反蘇戰爭。爲了這一目的，他們曾在專門學校中研究細菌學。

檢察官：「附帶說一下，你們似乎是在這些學校受殘酷的訓練？」久留島重治：「是的，我們是受這種訓練。我們被告訴說蘇聯士兵是高大的，所以我們必須學會用刺刀向上刺。」

檢察官：「那麼你知道你們是被訓練來對蘇聯作戰嗎？」久留島重治：「是的，我們知道。」

〔新華社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電據塔斯社伯力消息〕

二 訊問證人

在審問過菊池乘三與久留島重治之後，法庭即開始訊問證人。第一個被訊問的是證人前關東軍人專處處長田村大佐。他供稱，畑中將會告訴他七三一部隊是在準備細菌戰爭，並訓令他為七三一部隊挑選足夠的幹部。

這個證人說：「一九四五年六月，我接到關東軍總司令山田將軍要我去七三一部隊的命令。該部隊長石井四郎將一件公文送交關東軍司令，請求提供加緊該部隊工作的先決條件。石井四郎並請求增加醫生和增加各方面的人員。」

檢察官：「你在七三一部隊親眼看到什麼？」證人田村：「在到達該部隊時，我視察了各工廠、實驗室和拘押犯人的監獄。我看見大規模生產細菌戰爭工具的裝備，我也看見啮齒類動物和大量跳蚤。」

「在該部的房屋中，有作為細菌武器的砲彈和炸彈的樣品。在石井四郎的辦公室內，我看了一些說明細菌武器效率的圖表和圖解。在監獄中我看見四五十個犯人，他們是中國人和俄國人。在俄國人中，我看見一位婦女。有些犯人的腳上帶着腳鐐。他們大多數都躺在地板上，因為他們已絕對精疲力竭了。和石井告訴我的一樣，他們是在該部隊中被用來進行實驗的人。」

「石井四郎對我講，七三一部隊已有充分準備發動細菌進攻。他告訴我，戰爭一開始，就會把這些巨量致死細菌投入敵人中。證人說，我把七三一部隊已準備就緒可以進行細菌戰的情形親自報告給關東軍總司令山田將軍。同時，我並把用活人作實驗的情形報告給山田將軍。」

早晨庭至此休庭。

在午後開庭時首先向法庭提供證言的是證人古市。他曾以助理醫師的資格在該部隊中工作過一個長時期。

古市證明說，在一九四二年，他親自參加七三一部隊派赴華中的派遣隊。這一派遣隊由石井四郎率領，派遣隊的「工作」就是對中國軍隊和平民進行細菌攻擊。

檢察官：「作爲派遣隊的一員，你個人做過什麼事？」古市：「我在井裏與蓄水池中以及和平居民的住所散佈傳染病細菌。」

古市繼而談到所謂「石井點心」的情形：「在我們派遣隊所到達的一個地區，有兩個中國戰俘營，石井命令焙製三千枚點心並把傷寒與副傷寒細菌放進去。和其他人一道，我也參加了在點心中放細菌的工作。我們的翻譯官春日把放了細菌的點心發給戰俘。」

「中國戰俘受過這樣待遇，就被釋放了，好讓他們散播傳染病。後來，奉石井的命令，又製造了餅乾並將細菌放入其中。這些餅乾被留在戰俘營所在地，好像是被什麼人忘在那裏一樣。後來科學工作者蟹江告訴我，副傷寒細菌在促起中國居民中發生流行病方面最爲有效。」

古市在他的證言中進一步透露七三一部隊中施行慘不忍睹的暴行——他目擊或參加過這種暴行——的情形。他談到該隊的人員使五十位中國人染上傷寒，然後開始研究疾病的「進展」；使婦女染上梅毒，來研究防止梅毒的辦法；用活人做實驗，來研究凍瘡以及發泡瓦斯的效力。一切這些被拿來實驗並註定要最痛苦地死去的人都押在七三一部隊的監獄中。

次一提供證言的是證人立花，憲兵上校。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他是佳木斯憲兵隊司令，後來在滿洲國傀儡政府的軍隊中任憲兵顧問。

立花告訴法庭，憲兵隊奉關東軍的訓令，把註定要死亡的人送到七三一部隊的監獄中去。這些人因爲遭到各種「實驗」而痛苦死去從來沒有出獄的。他們是不經審訊用「特別運送」方式送去

的。他們之中有參加民族運動的人，即中國的愛國分子，還有與共產黨運動有聯繫的人，以及日本軍方所不喜的分子。

在立花敘述「特別運送」的詳情時，伯力聽衆——擁擠在法庭中的勞動人民自發地表示憤慨。這些人會被加上鍊鏢，送到監獄中，這就是說送到七三一部隊的監獄中去加以消滅。

在午後閉庭時最後提供證言的是證人憲兵中士倉勝。他曾經担任七三一部隊的憲兵。倉勝作證說，他曾經親身把憲兵隊部送到七三一部隊當作「特別運送」的人押去。他詳細敘述了準備細菌戰的日本軍人怎樣虐殺這些人、把他們當作試驗品的可怕情形。

檢察官：「告訴我們，證人，誰是七三一部隊監獄的典獄長？」倉勝：「七三一部隊隊長石井四郎中將的哥哥文官石井是典獄長。」

在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倉勝作證說，他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個人走出七三一部隊的監獄。此後，法庭即告閉庭。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法庭繼續審問證人。首先被審問的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七三一部隊任軍需官的堀田。他供稱：他在該部工作時，曾到該部在安達的細菌武器實驗站看過。他供稱：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四郎曾告訴他的某些僚屬說，對蘇戰爭將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九月開始，因此必需加緊製造細菌武器。他供稱，據他所知，在撥給七三一部隊每年一千萬日元的經費中，有七百萬元係用於準備與細菌武器有關的工作。

法庭繼即審問曾在七三一部隊軍需處第四科服務的證人瀨越賢一、佐佐木。瀨越供稱：第四科是從事製造陶瓷炸彈殼的，這些彈殼是準備裝帶有鼠疫的跳蚤的。佐佐木供稱，樋口少尉領導下的那一科的十名人員，曾去中國關內進行細菌破壞工作，他曾把一箱箱細菌送至飛機場，運交給該批人員。

法庭還審問了證人尾關、齋藤、桑原、煙木、高雪等五人。桑原供稱：在日本關東軍已向蘇軍投降後，當時在一百號部隊工作的木村、久保田、板田三人，曾用炭疽熱菌注射了六十匹馬，並把這些馬趕到蘇軍正在逼近的村莊中去，以便作爲傳染的媒介。前第十三軍司令部情報處處長高雪大佐供稱：第十三軍擁有由南京「榮」部隊人員組織的細菌部隊。一九四二年，該軍遵照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命令，進行了所謂浙江戰役。八月二十五日，石井四郎坐飛機到了十三軍的戰區。在十三軍被迫撤退後，就用飛機向對方陣地散佈傳染病細菌，因此中國軍隊陣地內就流行了傳染病。至此，法庭結束了對證人的審問。

〔新華社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伯力消息〕

三 蘇聯法醫學專家委員會的意見

蘇聯醫學院院士朱柯夫代表專家克拉斯諾夫等五人宣讀法醫學專家委員會的書面意見。專家委員會的意見書稱：「專家委員會以科學的分析，證實七三一部隊、一百號部隊和一六四四部隊的實驗與製造活動，乃旨在調查與製造細菌武器以及研究使用這種武器的方法。這些工作的內容異常狂妄，與人類科學的任務恰恰相反。意見書稱：「科學的流行病學許多世紀以來，曾經研究並發展消滅和預防流行病的方法，而這些部隊却研究出人工散佈這些流行病的方法。農業學家和獸醫學家盡了極大的努力，以增加有用植物的收穫和有用牲畜的繁殖，而這些部隊却研究出摧毀裸麥、小麥和牛、馬、羊的方法和手段。」

在談及七三一部隊在華中地區進行的細菌攻擊的危險程度問題時，專家委員會強調稱：石井四郎指揮之下在寧波地區進行的細菌攻擊，「不僅對於寧波地區居民異常危險，同時對於許多毗鄰地

區亦是很危險的」。專家委員會還指出，假如日本細菌部隊的計劃實現了，中立國家也會受到威脅，這種威脅係由於傳染病本身的性質和人工傳播的特點而產生的。

法庭至此結束其上午的審訊。下午，國家檢察官斯米爾諾夫在法庭上發言。

〔新華社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伯力消息〕

四 蘇聯國家檢察官的發言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蘇聯國家檢察官斯米爾諾夫在軍事法庭上發言，指出這次審判的重大意義，並對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者提出警告。斯米爾諾夫說：目前審訊的重要意義，遠遠超出確立被告人的個人罪名及確定他們的責任的範圍。一條反對和平與進步人類之最嚴重罪行的鎖鍊，將前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將軍和日本軍閥的罪惡意圖的執行人——日本陸軍特別秘密組織的細菌學家——連結在一起。由罪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計劃和準備的細菌戰，是反對愛好和平人們的侵略陰謀的一部分。

許多年以來，帝國主義的日本，一直都是遠東的主要侵略溫床，一九四八年結束的審訊日本主要戰犯的東京國際法庭，已經十分明確地證實：日本許多年來一直在準備進攻蘇聯。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稱：法庭認為日本在這一時間中，都在擬訂和計劃反蘇的侵略戰爭……這是日本國策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目的，在於侵佔蘇聯在遠東的領土。

在最大的壟斷企業聯合組織（它們與國內高級軍事員建集團勾結在一起）的主使之下，日本帝國主義者即預先安排好將蘇聯遠東，甚至將「烏拉爾以東的西伯利亞」，都包括到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裏。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蘇聯侵略意圖的未能實現，決不是由於日本戰犯的愛好和平。蘇聯遠

東的和平之所以能够維持，祇是由於斯大林的英明政策，由於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對加強蘇聯武裝部隊的始終不渝的關懷。

一九三六年，反和平陰謀最後形成。日本與希特勒德國會締結所謂反共公約，法西斯意大利也參與了這個公約。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國；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日本軍閥曾兩次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但都遇到重大的反擊。可是，這並沒有使日本軍閥放棄他們的侵略計劃。爲了達成這一目的起見，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準備最令人震駭和慘無人道的大批消滅人民的手段。

這次審訊證明，日本軍閥預先就忙於準備細菌戰，研究從事這種戰爭的最有效的手段及其使用方法。這樣，作惡的傢伙們（其中有一部分已在受審），企圖使人類復歸於傳染病盛行的時代，遭受霍亂與鼠疫的瘟疫，復歸於中世紀的最慘淡的日子。細菌戰的活動，不局限於前綫和敵人地區，它可能給中立國的人民帶來無法計算的苦痛。國家檢察官舉出在法庭初步調查過程中業已證實的無容置辯的事實，重述了日本軍閥準備細菌戰爭的史實。

國家檢察官指出，石井部隊在一九三九年日本於哈桑湖地區發動侵略戰爭時，曾對蘇聯與蒙古部隊進行細菌攻擊。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年，七三一部隊曾對中國人民發動慘無人道的細菌進攻。

國家檢察官提醒法庭說，敘述「玉」部隊（也叫做「榮」一六四四部隊）在南京從事「實驗」的文件，已提交東京國際軍事法庭，該法庭對這一事實感到興趣，要求美國檢察官提出更多的證據。此後不久，國際法庭蘇方檢察官斯米爾諾夫向美國的首席顧問提出了川島和唐澤的書面供詞，這供詞十分明確地揭穿了日本統治集團在用活人進行關於細菌武器的惡毒實驗中所犯的罪行。但是，很可能的，某些有勢力的人，很想阻止揭露日本軍方所犯的驚人罪行，也不願再有更多關於「玉」部隊的活動及石井部隊中所進行的類似實驗的文件，提交法庭。

國家檢察官繼而在分析確定被告個人罪行的證據時稱：日本陸軍的秘密細菌部隊，是按照日本天皇裕仁的敕令建立的。這一罪惡陰謀的參加者，還不止於你們將要判決的這些罪犯。我們知道，一些日本帝國主義的卑污的毫無道德的僕從，前日本陸軍上將、細菌專家石井四郎、北野和若松，前七三一部隊的職員太田、村上、井狩、田中、芳村等人，都沒有受審。由於他們是在我國的國境之外，他們目前正在帝國主義陣營反動勢力的卵翼之下。這些反動勢力本身也夢想他們有機會向人類投擲炸藥、原子彈和致命細菌。

國家檢察官說：這次審訊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赤裸裸地暴露了在極端秘密中準備細菌戰——最慘無人道的侵略武器之一——的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猙獰面目。只有蘇軍對敵人致命與毀滅性的打擊，才使世界免於細菌戰爭的恐怖。我們祖國從災難中挽救了人類文明。

判決不僅要嚴厲地、公正地懲罰那些目前站在被告席上的罪犯，而且要對新的世界大戰的煽動者發出不容漠視的警告，因為他們和即將被判罪的罪犯們，同是殘忍狠毒的人類仇視者。

讓所有那些正在計劃着新的反對人類的罪行並正在從事準備大規模屠殺人類新武器的人們牢牢記着：世界沒有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以蘇聯為首的強大的民主陣綫，在保衛着和平與安全。這是一個強大的和戰無不勝的力量，這個力量將能壓制新戰爭的每一個煽動者，並予以嚴厲的懲罰。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電據塔斯社伯力消息）

五 辯護律師的發言與日本細菌戰犯們的最後申辯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濱海軍區軍事法庭聽取辯護律師的發言。

律師貝洛夫爲被告山田乙三辯護說，被告身負監督細菌武器生產的職務，而這種細菌武器的戰術用途，曾在活人身上實行試驗，其所犯罪惡，乃是史無前例的最嚴重的反對人類罪。但律師說：我請求法庭考慮被告山田有足够的毅力與勇氣完全承認他的罪過。律師普羅柯彭科爲被告三友勝雄、菊池乘三、久留島重治辯護，請求法庭從寬發落，因爲這些被告原是下層工作者，他們在犯罪活動中只是助手。爲被告川島清、梶塚龍二、高橋高篤、佐藤春二、西豐彥、平櫻善作、唐澤富雄及尾上正雄等辯護的律師們，把他們的罪行規定爲給予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可怖而慘痛的災難的罪行，但請求法庭在判決時考慮到他們已經認罪悔過。

法庭繼而聽取被告的最後申辯。首先發言的是川島清。他說：「在我未到蘇聯之前，我對它抱着絕對錯誤的觀念。在被蘇軍俘虜之後，我才了解到我過去的觀念是多麼的錯誤。我清楚感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蘇聯人民給予我的人道的待遇。我對這件事情會加以思考，我終於深信這不是出於偶然而是蘇維埃制度的結果。我了解我所犯的罪惡不僅對我自己是一種恥辱，而對我的國家亦是恥辱。我準備接受法庭的最嚴肅的判決。」

被告唐澤高雄在其最後申辯時說：「遠在一九四六年，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我便說出並誠心懺悔我在七三一部隊所犯的一切罪行，我請求法庭給予公正的判決。」

接着發言的是被告山田乙三。他說：「我出身於軍人家庭，自青年起便服役軍中。在軍隊中，我受到了執行命令及士兵天職的教養。在被任命爲關東軍司令官之後，我準確而堅決地執行了陸軍省及日軍參謀總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我承認我對這些部隊準備細菌戰所犯一切暴行所負的責任。我充分了解我的罪過的嚴重性及我的罪惡的規模之大，因此，我並不考慮對我懲罰的輕重問題。」

被告梶塚、佐藤、平櫻、三友、高橋、菊池、久留島、尾上，相繼作最後申辯。他們都承認他

們的罪行，有的要求法庭給以公正的判決，有的要求法庭從寬發落。平櫻善作說：「這次審訊給我們參加準備細菌戰者以嚴厲的懲罰，這對於企圖準備這種戰爭的那些人，將是一個警告和良好的教訓。我希望不僅我們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且負責準備細菌戰的主要罪犯，現在未在這裏受審的日皇裕仁、石井將軍和若松將軍，也應受嚴厲的懲罰。」菊池乘三說：「我從孩童時代起便被教以要忠於天皇，在留住蘇聯四年間，幸賴蘇聯當局對日本戰俘溫暖而人道的待遇，我了解我受到多麼大的欺騙！我所受的教養是多麼需要！我的心靈起了根本的變化。我可惜細菌戰的主要策動者和組織者，未在這裏受審。我恨他們！」

法庭在聽完被告的最後申辯後，退庭進行討論。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電據塔斯社伯力消息）

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訊日本

細菌戰犯案的判決書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宣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審訊前日本陸軍軍人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一案的判決書。

審訊日期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濱海軍區軍事法庭由少將軍法官契爾特科夫任審判長，其他審判人員爲：上校軍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軍法官沃羅比耶夫及高級秘書哥爾金上校。國家檢察官——第三級國家法律顧問斯米爾諾夫也參加審訊。被告辯護律師有：波羅維克、別洛夫、山尼科夫、茲維列夫、波加切夫、普羅科朋科、魯克揚榮夫及波柯維蒂諾夫。

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在伯力城公開審訊日本戰犯一案的被告有：(一)山田乙三：將軍銜，前關東軍總司令；(二)梶塚龍二：中將醫官，醫學博士，前日本關東軍軍醫處處長；(三)川島清：少將醫官，醫學博士，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生產處處長；(四)西豐彥：中校醫官，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教練處處長；(五)唐澤富雄：少校醫官，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製造處科長；(六)尾上正雄：少校醫官，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長；(七)佐藤春二：少將醫官，醫生兼細菌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第五軍軍醫處長；(八)高橋高篤：中將獸醫官，化學家兼生物學家，前日本關東軍獸醫局局長；(九)平

櫻善作：中尉獸醫官，外科獸醫，前日本關東軍一百號部隊科學工作者；（十）三友勝雄：前日本關東軍一百號部隊上士；（十一）菊池乘三：伍長，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醫務士兼助理實驗士；（十二）久留島重治：前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一六二支隊醫務士兼實驗士。

上列十二人均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條所列的罪狀。軍事法庭的初步材料及法庭的調查材料證實：帝國主義日本的統治集團若干年來就在準備對蘇聯的侵略戰爭。一九四八年在東京結束的日本主要戰犯的審判證實：反蘇侵略戰爭是日本統治集團政策內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們以掠奪蘇聯的領土爲目標。

日本軍國主義者爲日本民族優越感的瘋狂觀念所驅使，爲在日本邪翼下建立「大東亞」的瘋狂觀念所驅使，並決定與希特勒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其目的，在於共同建立世界霸權，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違反人道作出任何滔天罪行。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他們反對愛好和平民族的侵略戰爭的罪惡計劃中，規定使用細菌武器，以散佈鼠疫、霍亂、炭疽熱和其他可怕疾病的致命的傳染病，從事大規模屠殺軍隊及包括老人、婦女與兒童在內的和平居民。

爲了這些目的，在日本陸軍內成立了若干特別機構，用以生產細菌武器，同時又準備了特別軍事部隊及破壞組，以細菌傳染那些日本打算侵略的國家領土上的城市、鄉村、貯水池、水井、牲畜和穀物。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滿洲並將滿洲變成其進攻蘇聯的橋頭堡壘之後，根據日本關東軍的密令建立了細菌實驗室，以一名不人道的細菌戰爭的理論家與組織者石井四郎爲首。一九三六年，當日本加緊進行反蘇戰爭的軍事準備的時候，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根據裕仁天皇的命令，在滿洲成立了兩大細菌機構，指定不僅從事調查進行細菌戰爭的工具，而且還生產足夠數量的細菌武器，以充

分供應日本陸軍。

這些機關是十分秘密的，爲了偽裝起見命名爲「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和「關東軍獸類傳染病試驗局」。後來又更名爲「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這兩個部隊有許多支隊，隸屬於關東軍的分遣隊及大隊，並按照日本反蘇的作戰計劃駐紮在進攻蘇聯的主要地點。這些部隊事實上就是戰鬥部隊，任何時候一有命令就可以使用細菌武器。

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及其支隊均屬於關東軍總司令管轄。這已爲前關東軍總司令梅津美治郎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發佈關於成立七三一部隊四個支隊的命令所證實。七三一部隊駐在哈爾濱二十公里附近的平房車站地區特別修建並有嚴格防守的軍營中，這是準備細菌戰的有力機構，其中有科學及技術工作者三千人左右，實驗室設有最近代化的設備與完善的器械。從它的機構中可以看到這個部隊及其實際活動的宗旨。這一部隊之下設若干處。其第一、第二、第四、第五處，分別負責培植實驗細菌以及訓練從事細菌戰的各項人員。一百號部隊駐在長春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從事和七三一部隊相同的罪行。

初步的調查與法庭的調查已證實，在華中與華南作戰的日軍中也組織了兩支準備細菌武器的秘密部隊，其暗號爲「榮字部隊」與「波字部隊」。這兩支部隊的活動，與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相同。

由於使用細菌武器也有使他們自己的部隊受到傳染的危險，日本統帥部便在各個營和各個團中組織了傳染病預防隊，使之隸屬軍隊中的醫務隊。這是準備細菌戰總計劃的組成部分。

七三一部隊與一百號部隊爲從事細菌戰而研究細菌戰的工具和方法，同時並以活人作試驗細菌武器效能的不人道的實驗。日本惡魔在這種實驗中殘殺了成千上萬的落在他們手裏的人。被告川島清的供詞證實，僅在七三一部隊中，每年就至少要屠殺六百名囚徒，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日

軍投降爲止，最少有三千人被害死。一百號部隊在被告高橋高篤的總監督下，也用活人作同樣不人道的實驗。

細菌武器的試驗，並不僅限於七三一部隊和一百號部隊中所作的實驗。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對華戰爭和對蘇的破壞活動中也使用了細菌武器。一九四〇年，七三一部隊特別派遣軍由石井率領前往華山戰區，用有特別裝置的飛機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因此，在華中戰區引起了鼠疫傳染病。

這種害死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和平居民的罪惡的活動攝成了電影，這個電影後來在七三一部隊中給日本陸軍最高統帥部的代表放映，被告山田也看了這個片子。

七三一部隊在一九四一年還派出了同樣的派遣軍到常德，那裏也傳染了鼠疫菌。

一九四二年，又在中國境內使用了細菌武器。這一次，七三一部隊的派遣軍（被告唐澤與川島都參加了準備遣支派遣的工作）與「榮」字部隊聯合行動，在日本軍隊在中國軍隊的壓力下被迫撤出的地區散佈了嚴重的傳染病菌，被告佐藤曾經有一個時期是「榮」字部隊的指揮官。

一百號部隊在幾年中間會先後派遣細菌組到蘇聯邊境，被告平櫻善作和三友都在這個細菌組內。這些細菌組對蘇聯進行細菌破壞，在邊境上的蓄水池中施放細菌。

這樣，在初步與法庭的調查中業已證實：日本帝國主義者曾經準備在對蘇聯及其他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時廣爲使用細菌武器，從而將人類投入新災禍的深淵中。

軍事法庭認爲本案各被告以下的罪狀業已成立：

一、山田乙三，自一九四四年至日本投降時任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指導他屬下的七三一部隊與一百號部隊準備細菌戰的罪惡活動。在使用細菌武器的各種實驗中，鼓勵了這兩個部隊對數以千計的人民的殘忍殺害。

山田曾採取措施使七三一部隊與一百號部隊有進行細菌戰的充分準備，並使其生產能力保證適

應軍隊對細菌武器的需要。

二、川島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任七三一部隊生產處長，爲該隊部的首要軍官之一，參加準備細菌戰，熟悉該部隊各處工作，並親自監督足以充分供應日軍細菌武器的大量致命細菌孵育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川島參加組織在華中地區使用細菌武器的戰爭。川島在七三一部隊的全部服務期間，親自參加成批謀殺囚禁在該部隊監獄中的囚犯，在罪惡的試驗中，傳染給囚犯以嚴重傳染病的病菌。

三、唐澤富雄，七三一部隊生產處科長，爲從事改進細菌武器工作的積極組織者之一，並曾參加準備細菌戰。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二年，唐澤參加組織在中國和平居民中散佈傳染病的派遣軍。唐澤曾數度親自參加使用細菌武器的實驗，由於實驗的結果，被囚的中國人和蘇聯公民被滅絕了。

四、梶塚龍二，自一九三二年即鼓吹使用細菌武器。一九三六年任日本陸軍部軍事衛生局局長，他協助建立特別細菌大隊並配備其人員，在他的推薦下，曾任大佐以及升任將軍的石井四郎，被任命爲該部隊的長官。由一九三九年起，梶塚龍二即任關東軍衛生局長，並親自指導七三一部隊的活動，供給該部隊以生產細菌武器的一切必需品。

五、西豐彥，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日本投降時任駐孫吳的七三一部隊六七三支隊支隊長，並積極參加生產細菌武器。西豐彥同時兼任七三一部隊第五處處長，爲關東軍各部隊的特別小隊訓練進行細菌戰的專門幹部。他親身參與以傳染傳染病細菌的方法謀殺被囚的中國和蘇聯公民。爲掩蓋該支隊和七三一部隊的犯罪活動，當蘇軍於一九四五年迫近孫吳城時，西豐彥下令焚毀支隊在該城的建築物、裝備和文件，並且執行了這一命令。

六、尾上正雄爲駐海林的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支隊長，曾從事研究改進細菌戰新型武器和準備七三一部隊所需物資的工作。他監督訓練細菌戰的專門幹部。尾上深知關於被囚禁在七三一部隊

的那些人的成羣被謀殺的情形，並且參與了這些最嚴重的罪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尾上爲了滅跡起見，親自焚毀了支隊在該城的一切建築、儲藏的物資和文件。

七、佐藤春二自一九四一年即任駐廣州的細菌部隊司令，該部隊的秘密代號名爲「波」字部隊，在一九四三年，他被委任爲類似的駐南京的「榮」字部隊的司令。佐藤在領導這些部隊的時候，參加改進細菌武器和準備細菌戰的事宜。佐藤後來任關東軍第五軍的軍醫處長，領導着七三一部隊的六四三支隊，他知道七三一部隊與六四三支隊活動的罪惡性質，並幫助他們生產細菌武器。

八、高橋高篤任關東軍獸醫局局長，他是生產細菌武器的組織者，曾直接領導一百號部隊的罪惡活動，負責以嚴重的傳染病傳染囚徒的無人道實驗。

九、平櫻善作，爲一百號部隊的人員，親自進行生產與使用細菌武器的研究。他曾幾次參加至蘇聯邊境的偵察，用以發現用細菌進攻蘇聯的最有效方法，同時，還在蓄水池中投放細菌，特別是在特里列奇地區。

十、三友勝雄，一百號部隊的工作者，曾直接參加製造細菌武器，親自進行以活人作細菌試驗的工作。三友是在特里列奇區投放細菌破壞蘇聯的行動的參與者。

十一、菊池乘三，是進行實際訓練的醫務助手，在七三一部隊六四三支隊的實驗室內工作，直接參加旨在發現新型細菌武器以及培養傷寒和赤痢菌的工作。菊池在一九四五年參加了訓練幹部從事細菌戰爭的專修班。

十二、久留島重治，爲七三一部隊支隊的助理實驗士，曾參加培養霍亂、傷寒及其他傳染病以及試驗細菌砲彈的專門訓練。

根據上述事實，濱海軍區軍事法庭認爲：所有上列被告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條中所列的罪行，依蘇聯訴訟程序法第三一九條和三二〇條罪狀成立，法庭考慮

每個被告犯罪的輕重判決如下：

山田乙三，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五年徒刑。

梶塚龍二，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五年徒刑。

高橋高篤，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五年徒刑。

川島清，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五年徒刑。

西豐彥，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十八年徒刑。

唐澤富雄，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年徒刑。

尾上正雄，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十二年徒刑。

佐藤春二，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二十年徒刑。

平櫻善作，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十年徒刑。

三友勝雄，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十五年徒刑。

菊池乘三，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兩年徒刑。

久留島重治，判以拘留勞動改造營三年徒刑。

在判決書副本送給被判者之後，他們可以在七十二小時內向蘇聯最高法院第二專門委員會上訴。判決書是由審判長——契爾特科夫少將軍事法官及伊里尼茨基上校軍事法官和沃羅比耶夫中校軍事法官簽字。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消息〕

馬耶夫斯基評伯力審判日本細菌戰犯案

馬耶夫斯基在真理報上寫道：在伯力對前日本陸軍軍人的審訊，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犯罪惡的驚人圖景。由被告的供詞所補充的起訴材料，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日本關東軍統帥部是奉裕仁天皇和日本參謀部的密令指導準備與進行細菌戰的。在前關東軍總司令梅津及其繼任者被告山田的指導下，配有最新裝備的細菌殺人工廠，在滿洲展開了緊張的活動。奉裕仁天皇命令成立的這支極端秘密的部隊加緊準備着毀滅千百萬人民的工具，這種準備工作在日本陸相，後來又任日本首相東條的特別關心之下，獲得了頭等的重視。日本政府不惜以鉅量金錢用於這種現代吃人生番的「科學研究工作」。

馬耶夫斯基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主要任務是準備對蘇聯廣泛使用細菌武器。準備戰爭（包括細菌戰）的工作，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一九四五年五月，細菌殺人工廠的活動特別加緊起來。七三一部隊長石井告訴他的僚屬說：「任何一天都可能有對敵人發動細菌進攻的必要性。」被告山田和唐澤都承認，細菌進攻不只是計劃要對蘇聯、中國和蒙古發動，而且還要對美國和英國發動。但日本軍國主義者這些計劃，已經被橫掃日本百萬關東軍的蘇軍所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懷着建立世界帝國的計劃和大規模侵略戰爭的計劃，這種計劃裏規定要日本軍國主義者奪取蘇聯的遠東部分、中國、滿洲、朝鮮和南洋諸國。

作者繼續稱：在第二次大戰中擊敗日本帝國主義以後，主要任務就是要解除日本武裝並消除日本

軍國主義復活和侵略再起的先決條件，以便將日本建設爲一個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宣言，已經精確地規定了這些任務。在通過波茨坦宣言後，美國就用一切辦法來破壞其履行。美國從一開始佔領日本的時候起，就使與這些日前在伯力受審的戰犯們同處一個陣營的人們上台當政。日本和美國反動派對日本工人階級、民主黨派和團體的攻勢，正在一天天地猛烈。美國與日本的壟斷資本的緊密聯繫，是不容置辯的事實。這種聯繫旨在便利日本的迅速重整武裝，把日本變爲美國在遠東的主要跳板。美國佔領當局和以吉田爲首的日本統治集團，力圖在人民中間煽起報復主義情緒，發動瘋狂的反蘇運動，鼓勵日本軍國主義者對蘇聯國土的橫蠻要求。

馬耶夫斯基着重說：侵略計劃的組織者和鼓吹者，已出來保衛目前在伯力受審的殺人犯。據合衆社稱，麥克阿瑟總部的官方代表說，該總部的化學部已經作了『充分的調查』，而且『毫未發現任何東西足以說明日本人使用過細菌武器』。爲此，馬耶夫斯基寫道：早在一九四八年二月，華盛頓郵報報道稱，在極靠近美國首都的地方設有研究細菌武器的實驗站。一九四七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兩年，有一片試驗場被撥給這個試驗站，以便進行從飛機傳播傳染病的試驗。前美國陸軍部長福萊斯特爾在神志還清明的時候說過，繼續研究是必要的，這樣美國可能在將來使用細菌武器。馬耶夫斯基宣稱：這就是爲什麼伯力審判不僅僅是審判這一羣日本戰犯——法西斯政權的產物的原故。這是審判一切準備着反對人類的新罪行的黑暗勢力，這是警告全世界的和平與進步的支持者：要警惕！必須粉碎匪徒的新戰爭計劃。

〔新華社北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消息〕

正義的審訊

「人民日報」時評

蘇聯國家檢察機關對日本戰犯山田乙三、川島清等十二人在日寇侵略中國戰爭中，曾製造和使
用細菌武器的嚴重罪行提起控訴，並由濱海軍區軍事法庭開始審訊。這一審訊，乃是維護世界人類
道德，維護遠東與世界持久和平的正義舉措，我們中國人民曾經經歷了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對於
偉大友邦蘇聯的這一正義舉措，感到極大的興奮，表示完全贊同與擁護，並要求嚴懲這些萬惡不赦
的法西斯戰爭罪犯。

在第一天的審訊中，便充分暴露出日本法西斯的猙獰面目是何等的兇殘，是何等瘋狂與滅絕人
性！審訊證明，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我國戰爭中，曾組織了龐大驚人的細菌武器部隊，用成批的中國
和蘇聯無辜人民，進行多次罪惡「研究」和「實驗」，因此而慘遭屠殺的中蘇人民在三千以上。審
訊證明，在華中華南的戰場上，日本法西斯會散佈各種細菌，無數的中國和平人民因此而死於非
命。審訊證明，日本法西斯會在我東北毗連蘇聯的地區建立使用細菌武器的基地，曾妄想一旦發動
侵蘇戰爭，便大量使用細菌武器以塔殺蘇聯和平人民。而東北解放後，在北部廣大地區中，鼠疫會
長期蔓延，無數居民因此死亡，使我東北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痛苦與損失，這就是日本法西斯以東北
為「實驗」細菌武器地區而遺留的罪惡，幸賴我民主政府在友邦蘇聯援助下大力組織搶救，始將鼠
疫撲滅。現在，友邦蘇聯審訊這些滅絕人性的細菌武器的製造者與使用者，正是蘇聯人民對我國人
民深厚友誼的表現，是維護中國人民生存權利的正義行動。

這一審訊，不僅是日法西斯戰爭罪犯們應得的懲罰，而且也是對企圖以細菌武器威脅遠東與世界和平的美英戰爭販子們一個有力的警告：世界人民對戰爭罪犯是不能饒恕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蘇聯政府關於日本細菌戰犯問題給我國政府的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李克農副部長，於二月一日收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代辦史白夫送來的蘇聯政府致我國政府的照會一件（編者按：同樣照會已於二月一日由蘇聯駐華盛頓和倫敦大使分別送交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照會全文如下：

副部長先生：

本人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外交部長之命榮幸地作如下之通知：

伯力濱海軍區軍事法庭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公審山田、高橋、梶塚及其他日本戰犯，證實了以日本裕仁天皇爲首的統治集團多年以來即秘密準備細菌戰爭——絕滅人性的侵略武器之一。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其準備反對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侵略戰爭的罪惡計劃中，預備大量使用細菌武器，以散佈鼠疫、霍亂、傷寒、壞疽病、炭疽熱病及其他可怕的致命傳染病方法來消滅軍隊及平民居民，包括老人、婦女與兒童在內。

根據日本裕仁天皇的命令及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任務所專門組織的日本軍隊的細菌機關中，大量繁育了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熱病的致命細菌及其他危險的傳染病菌，製造了散佈細菌的炮彈和工具，訓練了特種部隊，以便大量傳染居民、貯水池、住宅、播種田地和牲畜。

這些機關非常機密，爲了偽裝起見，命名爲「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和「關東軍

獸類傳染病試驗局」。後來又改名爲「七三一號部隊」和「一百號部隊」。這兩個部隊都有許多支隊，隸屬於關東軍的分遣隊，各駐紮於日本反蘇作戰計劃中所標誌的主攻方向。

「七三一號部隊」駐紮在距哈爾濱市二〇公里，在平房車站地區專門建築起來的小城裏，整個小城宣佈爲軍事禁區。該部隊計有三千科學與技術工作人員並擁有多數的實驗所和強有力的大量製造細菌的裝備，用以保證進行大規模細菌戰爭的可能性。

在審判中證實，這些部隊由五個處組成，這些處中只有一個處，第三處，是從事該部隊的公開業務，即管理部隊用水供應事宜的。這個處公開地駐在哈爾濱城裏，即不在上述專門設防的軍區小城領域之內。所有其他四個處都是專門從事於準備和進行細菌戰爭有關的問題。

第一處名爲研究處，從事研究和繁育致命細菌，並從中選擇出認爲作爲細菌武器最有效的種類。

第二處是實驗處，從事在活人身上檢驗各種細菌的效力，並設計向敵區傳染細菌的炸彈和方法。在這個處中有四千五百個專門繁殖爲蔓延鼠疫傳染的跳蚤養殖所。爲了進行利用空軍幫助使用細菌戰工具的罪惡實驗，該處在安達車站附近設有專用的靶場和空軍部隊。

第四處是所謂生產處，其任務是大量生產已選擇好的可作爲細菌戰最有效的細菌。

最後，第五處名爲「教育處」，以訓練使用細菌戰工具的幹部。

「一百號部隊」的任務與「七三一號部隊」的任務大同小異，其不同之處是該部隊是繁育傳染牲畜和農作物的細菌（壞疽病，炭疽熱病及其他細菌）。

在法庭上證實，除了以上指出的在北滿的兩個部隊外，日本人在華中和華南也組織了兩個類似的秘密機關，名爲「榮」部隊和「波」部隊。

日本的狂妄者們準備用細菌屠殺蘇聯的，中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和美國的軍隊，曾用

成千成萬的人來作此種大批毀滅的工具的實驗而致死亡，主要的是中國人和蘇聯人。僅僅在「七三一號部隊」因進行非人性的罪惡的實驗就野蠻地弄死了三千多人。

在審判中並證實了，日本侵略者們不僅是準備了，而且在實現其侵略計劃中已不只一次地使用了細菌武器：如一九三九年在哈爾新——葛爾河區域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日軍在上述各地施用細菌，引起了鼠疫和傷寒傳染病。

日本侵略者們準備進攻蘇聯，想廣泛地使用細菌武器，爲此目的在邊境進行了專門的偵察並實施了若干次反蘇的細菌襲擊。

蘇聯法庭已經判決了十二個犯準備與使用細菌武器罪的日本戰犯。

然而，要是讓造成這些慘絕人寰的罪行的其他主要組織者與鼓勵者逍遙法外，則是不公正的。此類戰犯首先就是：

1、裕仁——日本天皇。在伯力的公開審判中已經確定在滿洲的領土上設立日本陸軍爲準備細菌戰與使用細菌武器的中心，是奉裕仁的特別密令而實行的，這個中心名爲「關東軍部隊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而後名爲「七三一號部隊」所偽裝起來的。

在這個秘密組織中，大規模地準備了反對蘇聯、中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美軍與其他國家的細菌戰底工具，該部隊於一九三九年在哈爾新——葛爾河地區應用細菌武器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與蘇聯，而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則用來反對中國。

前日本最高軍事參議會議員，與關東軍總司令山田將軍供稱：

「駐紮於滿洲的七三一部隊，是爲了準備主要對付蘇聯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與中國的細菌戰的工具，而組織起來的。」

下列山田將軍的供詞，證明七三一部隊底活動陰謀隱藏到了什麼程度：

「七三一部隊公開名爲「關東軍用水供應及疾病預防局」，這顯然是對該部隊的真實使命的掩護。爲此目的，七三一部隊的工作人員穿着一般的軍服，沒有醫務工作的特別徽號。我們深恐大批醫務工作人員的聚集，會引起對七三一部隊工作的真正性質，發生不利的懷疑。」

山田在說明準備大規模使用致命細菌來大量消滅人民時，供稱：

「……由於按照改善最有效的方法使用細菌武器的一切準備工作之順利完成，根據天皇總部的第一道命令，一九四五年就開始了大規模製造細菌武器及在任何方面實際使用細菌武器的時期：……」

前日本陸軍省醫務局局長（後來爲關東軍醫務局局長）梶塚中將供認：「七三一部隊是在一九三六年奉裕仁天皇之特別密令組成的。」

梶塚供稱：「我本人知道這個命令和附在後面的該部隊的人員名單，是因爲經過我親蓋私章而簽收的。」

這一部隊曾於一九三九年改組，部隊的活動範圍擴大了，細菌武器的製造急劇地增加了，而構成人員的數目增加了兩倍。這一改組也是奉裕仁天皇另一道密令而進行的。

關於這方面，梶塚將軍繼續供稱：

「大約是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在關東軍司令部簽閱了這個命令。除此而外，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奉裕仁天皇的一個或兩個密令，爲七三一部隊又添設了四個支隊……。」

梶塚將軍在法庭上所指的那四個支隊，曾駐紮在與蘇聯接壤的地區。這已有文件所證實，特別是爲前關東軍總司令梅津將軍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 398——412 號的命令所證實。

七三一部隊的處長陸軍少將醫官川島同樣供認：七三一部隊於一九三六年組成，而該部隊之各支隊是於一九四〇年根據天皇命令而建立的。關於這方面川島供認如下：

「七三一部隊根據日本天皇之密令成立於一九三六年，……當我在七三一部隊工作，擔任總務處長職務期間，在部隊卷宗裏會親眼看見過天皇的這個密令……。一九四〇年的天皇命令預定該部隊的人員要增加到三千人，其中包括根據該部命令在滿洲各地新成立的各個支隊在內……。」

因此，（根據準備細菌戰爭的主要參加者）前關東軍陸軍醫務局長梶塚中將及川島的供詞便揭露了裕仁天皇是準備細菌戰主要參加者之一。

2、石井四郎——中將醫官。在審判過程中充分證明了石井在罪惡的準備細菌戰和實際使用細菌武器反對蘇聯，中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中，為積極的組織者。

石井為準備細菌戰會組織了並領導了日軍秘密中心——七三一號部隊。在石井直接領導之下，進行了細菌戰準備方面的罪惡研究，特別是用活人來作慘無人道的實驗。

石井直接地研究出一種使用跳蚤傳染鼠疫的方法，用來作為細菌武器。他設計了一種特別的陶瓷炸彈，名為「石井炸彈」，利用空軍用跳蚤來傳染鼠疫。

為了進行侵略的細菌戰，石井又親自研究出一種大量孵育細菌的方法（特別是，設計了一種所謂「石井孵育器」）。

如伯力審判中所證實，少將醫官川島清，中佐醫官西豐彥及七三一部隊助理士久留島重治供稱：石井將軍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當中曾親自帶領七三一部隊的駐華派遣軍，在征伐期間，他們使用了各種細菌武器，引起鼠疫、傷寒、副傷寒和其他疫病的蔓延，使成千的中國和平居民遭到死亡。

證人古市——七三一部隊派遣軍的參加者之一——在法庭上證明：在石井的直接命令之下，曾使著水池染上各種細菌，在食物中放毒，並進行了其他各種最嚴重的罪行。

前七三一部隊的一個處長中佐西豐彦的供詞證實了：一九三九年根據石井的發動，曾在哈爾新——葛爾河區使用過細菌武器，來反對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五年，當石井再次任命爲七三一部隊隊長時，他準備了細菌工具的使用來對付蘇聯，美國和英國。

少將醫官川島在審判中供稱：一九四一年夏，石井曾在一次秘密會議上通知各處長稱，部隊的活動已獲得日軍參謀本部的認可，由於德國希特勒反蘇戰爭的開始，參謀部曾下達積極準備細菌戰，擴大致命細菌生產的指示，經石井實施完成。

石井一切活動的特點是非常殘酷和絕無人性。他和東北日本憲兵隊和軍隊特務機關有着密切的聯系。七三一部隊從他們那裏收到所謂「特別運送品」的成千成萬的人，用作罪惡的實驗，這些人結果必遭慘死。

前關東軍總司令山田說明石井是準備細菌戰的最積極的參加者之一。

山田供稱：「七三一部隊」是石井的「寵兒」。所以一九四五年他又受命擔任該部隊隊長的職務，他之出任隊長就是直接與當時各細菌部隊積極工作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是與陸軍省的擴大製造細菌武器的指示有關係的。

8、北野政藏——中將醫官。審訊的材料證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期間，他曾任七三一部隊長官，直接領導過細菌戰的準備工作，並參加了一九四二年使用細菌武器反對中國的組織工作。

北野的罪惡活動，已爲前關東軍總司令山田將軍、少將醫官川島清、松村泊勝少將與梶塚龍二中將的供詞所完全揭露。

曾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視察過七三一部隊的山田將軍供稱，北野在報告該隊的活動時曾指出，該

隊的任务是：

「……研究有關準備進行細菌戰的方法的各種問題……北野曾向我報告七三一部隊生產處的情形，該處正在大規模地從事製造足以進行攻擊戰的各種專門的細菌藥劑。」

據山田本人供認，他在聽取北野的報告並親自視察七三一部隊的工作後，「曾因研究工作底規模與該部隊具有極大的可能製造細菌武器而大爲吃驚」。

松村少將關於北野所犯的罪行，供稱如下：

「一九四四年底七三一部隊隊長在關東軍司令辦公室作了報告。北野作了關於應用傳染鼠疫的跳蚤作爲細菌武器的方法的報告。……山田批准了北野所提出的應用傳染鼠疫的跳蚤作爲細菌武器的方法。」

關於這點，山田供稱：

「一九四四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北野將軍向我作了一個關於將鼠疫蚤用作細菌戰底手段的應用結果的報告。除了北野的報告還有從七三一部隊運來的專門的影片，以及各種圖表，這些圖表指出了那些已進行藉飛機傳播傳染鼠疫跳蚤的實驗地區……報告時他出示各種表格，這些表格一目了然地顯示出進行調查鼠疫細菌所傳染區域底結果。」

「我既然認爲應用傳染鼠疫的跳蚤的方法是極爲有效的，便親自批准了北野的報告，並向他們提出了應用細菌武器的方法。應用傳染鼠疫的跳蚤的實驗結果曾呈報天皇統帥部。」

中將醫官梶塚的供詞使北野中將被判明犯了下述的罪狀：他於一九四二年曾參加組織那使用細菌武器進攻中國人的派遣隊，並參加用活人進行慘無人性的實驗。據梶塚供稱，他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在訪問七三一部隊時聽取了北野關於該隊活動的報告。北野報告說：「……七三一部隊底一組工作人員已經開往上海以南地區的中國前綫，在那兒從高空把大量傳染鼠疫的跳蚤向有中國居民的土

地上撒下，而這些跳蚤落下的地方，就發生了鼠疫……此外，北野並向我敘述在安遠車站地區還進行了填滿了炭疽熱細菌的慢性炸彈的實驗。這種炸彈的彈片擦傷了人與動物，就使它們染上炭疽熱。」

北野在七三一部隊隊長任內的罪行，同樣也爲少將醫官川島底供詞所證實。川島會親自參加在北野領導下「討論有關研究，製造細菌手段及其在戰爭中之實際應用的各種問題」的會議。

4、若松次郎——少將獸醫官，一九四五年曾任一百號部隊隊長，據伯力審判的材料證明，他曾經從事製造細菌武器，並且使用貯水池、牧場與牲畜染上炭疽熱細菌、鼻疽菌與其他熱瘟細菌的方法實現了破壞活動。該隊也對活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

前關東軍總司令山田將軍承認，一百號部隊曾經從事尋求應用熱瘟菌及其大量製造的工作。關於若松所犯的罪行，山田將軍作了如下的供詞：

「一百號部隊底使命與實際活動，在準備細菌戰上是與七三一部隊底使命與活動完全類似的，差別只是七三一部隊所製造的細菌武器，是預定用來大量消滅敵人的兵力，而一百號部隊底熱瘟菌的製造，則是預定用來消滅牲畜的。」

前一百號部隊隊員陸軍中尉平櫻，關於若松參加細菌武器底積極準備工作一事曾供稱：若松在一百號部隊的工作人員中曾不止一次地說：

「萬一日本與蘇聯開戰，一百號部隊就該成爲製造各種大量細菌與烈性毒藥的工廠，來進行反蘇的破壞及細菌戰。」

平櫻同樣也揭發了若松的另一點：在他的指示之下，曾經派出了專門的偵察破壞派遣隊到特里列奇區和海拉爾區去研究進行反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細菌破壞活動的可能性，並且事實上實現了這種破壞活動。研究進行的結果已報告若松將軍，而他則對實行破壞活動又作了進一步的指示。

前一百號部隊工作人員三友與畑本在審判中的供詞已經證實，在若松領導的該一百號部隊中，曾經使用活人進行慘無人道的罪惡實驗的方法殘暴地弄死了他們。

前日本關東軍獸醫局長，中將獸醫官高橋高篤的供詞，暴露了前一百號部隊隊長若松的罪狀：他曾與關東軍參謀部謀報處密切勾結，親自領導細菌武器底罪惡研究與細菌破壞活動的準備工作。

高橋同樣也揭發了若松的另一點：他曾於一九四一年在前關東軍總司令梅津處，參加一個討論細菌戰底準備工作的會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若松又參加過一個類似的會議，該會在前司令山田的辦公廳內舉行。會上高橋報告了自己對於應用細菌武器的計劃。

5、笠原行雄——中將，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關東軍參謀長期內，實現了對於反蘇細菌戰的準備工作的領導，並且直接參加應用細菌武器具體方法的擬製。

笠原在準備細菌戰中的積極作用，已爲山田將軍、松村少將，中將獸醫官高橋、田村大佐以及其他在審判中被傳訊的被告與證人的供詞所完全證實。

前關東軍參謀部人事處處長田村大佐在談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初在被派他擔任該項職務時說：

「……笠原中將對我說，既然七三一部隊……準備細菌戰，我就應該以分外的注意去對待它。」

至於制訂各項應用細菌武器的方法問題，山田將軍供稱：

「……爲了研究應用細菌武器的方法，曾經成立了一些特別委員會……由參謀長擔任這些委員會的主席……委員會關於使用細菌戰爭手段的決定曾呈報關東軍司令，並經他批准後報告給日本總參謀部。」

該參謀部作戰處處長松村少將，在說明關東軍參謀部準備反蘇細菌戰的活動時，供稱：

「……在接獲關於增加細菌武器製造的指示以後，笠原委託我研究應用細菌武器對付蘇聯的可能性問題……我研究了這一問題，並向笠原作了一個適當的報告，而笠原，我已說過，就批准了我的意見……我向笠原報告，萬一對蘇聯作戰，應該在伏羅希洛夫、伯力、海蘭泡與赤塔等地區應用細菌武器。」

一九四四年秋，笠原曾參加討論應用「石井式」細菌炸彈的方法問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笠原參加了最高參謀特別會議，會上討論了細菌試驗的結果問題，這次試驗是一百號部隊爲準備實際應用細菌武器反對蘇聯而進行的。

綜上所述，證實笠原是細菌戰的組織者之一，他曾直接研究應用細菌武器主要用來反對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的問題。

因此，伯力審判中所判明的材料和濱海軍區軍事法庭的判決書業已證明：在準備和實現那反對人類的滔天大罪的細菌戰中起主導作用的，不僅有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所早已宣判的日本戰犯，和根據伯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所宣判的十二名日本戰犯，而且還有日本天皇裕仁和日本陸軍將軍石井四郎（前七三一部隊隊長）、北野（亦爲前七三一部隊隊長）、若松次郎（前一百號部隊隊長）和笠原行雄（前關東軍參謀長）。

根據這些點，並考慮到：

細菌武器已爲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的日內瓦議定書所禁用，早已爲各文明民族所斥責，視爲違背民族正義和天良的最嚴重的罪行。因此，上述罪行即已成爲對於戰爭的立法和慣例與公認的國際法常規的野蠻的破壞。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同盟國在遠東委員會的決議中評定破壞戰爭立法與慣例者作爲戰爭罪行論。而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決議中規定了「應嚴格裁判一切戰犯」。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遠東委員會決定了「……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以便暴露、追究、逮捕和監禁一切有戰犯嫌疑的分子」，並規定了爲了研究有關遠東各戰犯的事宜，盟國總司令必須「任命特別國際軍事法庭」。

蘇聯政府提議：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遠東委員會決議（FEC·00713號文件）之第五條「A」款，於最近期內委任特別國際軍事法庭，並把已被揭露爲完成反對人類的滔天罪惡的戰犯日本裕仁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行雄等將領交給上述國際法庭。

同時，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宣佈所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伯力對本照會中指出所暴露了的罪惡滔天的山田，梶塚及其他日本戰犯之審判材料，待國際軍事法庭組織後即將全部交其處理。

副部長先生，請接受我對你的崇高的敬意

此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先生閣下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北京

史白夫（簽名）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電）

我國政府同意蘇聯政府提議審訊日本細菌戰犯的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李克農副部長二月八日以照會一件，送交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代辦史白夫先生。

照會全文如下：

代辦先生：

我榮幸地通知您，已收到了二月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照會。茲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鄭重申明：完全同意蘇聯政府提出的關於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遠東委員會決議（四四〇・〇〇七之三號文件）之第五條第A款，於最近期內委任國際特別軍事法庭，來審訊罪大惡極損害人類的日本五大細菌戰犯，即日本天皇裕仁、石井四郎中將、北野政藏中將、若松次郎少將、坂垣征四郎中將、等原行雄關東軍參謀長等五人的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在召開這一國際軍事特別法庭時，在中國方面，只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遺的代表參加，決不能再由早已喪失代表中國資格的蔣介石反動集團的人員參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蘇聯在伯力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對日本細菌戰犯的審判，充分地表現了蘇聯對損害人類的日本戰犯給了應得的懲罰，對保護人類利益及和平的事業盡了偉大的責任。蘇聯政府的正義和功績，已得到了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的讚揚和擁護，尤其對於身受帝國主義日本的細菌毒殺的中國人民，更增深了對於法

西斯敵人的憤慨及對於偉大蘇聯友邦的感激。蘇聯政府在照會中所提出在最近期內委任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審判以日本天皇裕仁爲首的五大細菌戰犯的這個正義的號召和提議，將得到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更熱烈的擁護，只有那存心扶植日本帝國主義再起，並積極準備新的世界戰爭的帝國主義政府才會拒絕蘇聯政府這一正義的號召和提議，才會繼續包庇罪大惡極毒殺人類的頭等戰犯日本天皇裕仁。

願向

貴代辦先生致以崇高之敬意。

此照

蘇聯駐華大使館代辦史白夫先生

李克農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北京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電〕

「真理報」論懲辦日本戰犯

「真理報」以「日本戰犯的罪行必須受到應得的懲罰」為題發表社論稱：二月一日，蘇聯政府照會美國、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議在最近的將來指派特別國際軍事法庭，將犯有對人類最大罪行——準備與使用細菌武器——的日皇裕仁與石井、北野、若松及笠原等日本戰犯提交該法庭審訊。

蘇聯政府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細菌戰主要組織者及鼓動者所犯的罪行。日本帝國主義者使用一種最野蠻的侵略手段，他們的滔天罪行已於去年十二月伯力舉行的對山田、高篤、梶塚及其他日本戰犯的公審中暴露出來了。

滿洲的關東軍司令部，奉日皇裕仁、日本陸軍省與參謀本部的直接訓令，曾建立了特別的細菌部隊。這些死亡製造廠生產了大量的致命的細菌、散播細菌用的砲彈與設備，另外，還組織了部隊，以使居民大批染受傳染病，並在住房、水源、田野與牲畜身上散播細菌。日本戰犯準備以億萬細菌與病菌毒害蘇聯、中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居民與美國軍隊，他們以成千的人民——中國、蘇聯及其他國家的公民來試驗大規模屠殺的武器。僅在這種部隊的一個部隊中，那些身着將軍服與軍官服的殺人魔王，便把三千多人民殘酷地磨折死了。伯力審判的文件證明：在若干場合，日本軍國主義者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與中國使用了細菌武器，進行了野蠻的遠征，並引起傳染病的流行。

十二名犯有準備與使用細菌武器罪行的日本戰犯，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對這種滔天罪行

的主要組織者與鼓動者，首先是日皇裕仁與石井、北野、若松及笠原四將軍，正義尚未申張，他們仍未受到懲辦。人民的天良是不能容忍這些人逍遙法外的。伯力審訊時，被告的供詞暴露了日皇裕仁是準備對蘇聯、中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進行細菌戰的主要參加者之一。正是裕仁，他在一九三六年祕密下令建立了七三一部隊，這支部隊變成了日本軍隊準備細菌戰及使用細菌武器的中心。日本石井將軍以前是細菌戰的積極組織者與鼓動者，現在則在日境美國佔領軍總部中受到庇護。石井本人在一九四〇——四二年便會率領細菌派遣軍至中國。在他的策動之下，日本軍隊對與蘇聯友好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動兇惡進攻時，曾在哈爾新——葛爾河地區使用了細菌武器。伯力的審判又證實了日本戰犯北野將軍曾主持過細菌戰的準備工作，並且在一九四二年還參加過對華細菌戰派遣軍。若松將軍也列身於那些犯了最慘無人道的罪惡的人們的行列中。他曾指令派出諜報組織——陰謀破壞隊到特里奇區和海拉爾地區去。在伯力審判中暴露出：前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將軍是當時準備對蘇細菌戰的首腦人物之一。

「真理報」着重指出：假如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計劃，未被蘇聯和蘇軍粉碎的話，則大規模的細菌戰爭及其對人類的一切可怖後果，恐已成為可怕的現實。英勇的蘇軍，對日本侵略者施以毀滅性的打擊，他們打垮了關東軍而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蘇聯人民在偉大的斯大林領導之下，從希特勒的野蠻殘暴中和日本帝國主義所準備的可怕的罪惡中，拯救了人類，拯救了文化。

社論繼而指出：蘇聯政府認為，對人類犯有滔天罪行的組織者與鼓動者，應受到應得的懲罰。蘇聯政府的照會，充滿了對愛好和平民族的偉大關懷，保衛他們使免於新戰爭的災害、免於帝國主義匪徒利用野蠻方法大量毀滅人民的災害。

蘇聯政府之要求懲罰主要的日本戰犯，完全符合於以前所承担的國際義務。衆所週知，所有參加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人們，曾向人民保證過：凡破壞普遍承認的國際慣

例和對和平的人民犯有罪行的戰犯，都不能逃脫他們應得的嚴厲的懲罰。在一九四三年，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國政府的首腦，在他們的宣言中宣稱：戰爭罪犯無論他們逃至天涯海角，一定要使他們歸案法辦，俾正義得以申張。蘇聯政府要求：對人類犯有最慘無人道的罪惡的日本戰犯，應予歸案法辦。

任何一個堅決珍愛和平的人，都會堅主立即履行規定要嚴懲所有戰犯的協定。全世界擁護和平的人，都要求澈底打垮侵略力量。懲罰所有主要的戰犯，即意味着給予戰爭製造者以新的打擊。

「真理報」社論的結語稱：蘇聯政府致美、英、中三國政府的照會，已經受到蘇聯人民和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深為滿意的歡迎。他們認為這是蘇聯擁護世界和平反對新戰爭挑撥者而進行的不懈的鬥爭之又一新的證明。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電據莫斯科消息〕

戰犯必須歸案法辦

『人民日報』社論

昨日本報所發表的蘇聯政府照會，提出了迅速審判日本細菌戰爭罪犯裕仁、石井、北野、若松、笠原等人的要求。這個要求，完全符合於中國人民的意志。還在去年十二月蘇聯濱海區軍事法庭審訊十二名日本細菌戰犯並判處徒刑的時候，中國人民就已經表示熱烈擁護蘇聯政府的這一正義行爲，並希望一切尚未受審的罪犯能够迅速歸案法辦。

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來橫行遠東，我中國人民首蒙其禍，千百萬和平居民受盡殘酷的毒害，這一筆血海深仇，是我們中國人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的。這次細菌戰犯山田、川島、唐澤等的供詞中，進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的血腥罪行。他們把我們東北作爲準備細菌戰爭的基地，建立細菌殺人工廠，用活人作慘無人道的冰凍實驗，並曾於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年，在我國湖南常德和長江下游，散佈鼠疫毒菌。這種完全滅絕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獸行，必須加以嚴厲的懲辦，才能伸張人類的正義，保障世界的安全。

但是喪心病狂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爲了準備新的侵略戰爭，竟不惜對罪惡滔天的日本侵華戰犯故意寬縱，甚至已經逮捕的也被釋放。例如前日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前日寇侵華海軍系統特務頭子兒玉譽志夫，前日寇駐僑軍大使谷正之，前日寇滿州重工業會社總裁鮎川義介等首要戰犯，現在都逍遙法外。至於日本侵華戰爭和細菌戰爭的第一名罪犯裕仁，不但未被逮捕審判，而且還披美國佔領軍所優禮，至今仍然是日本的天皇。其他細菌戰犯，除已由蘇聯審判者外，也沒有

受到任何懲罰。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這種悖謬的和危險的情況。中國人民堅決支持蘇聯政府的正義主張，要求迅速審判裕仁、石井、北野、若松、笠原等細菌戰犯，並要求審判一切未受應得懲處的日本戰爭罪犯。

審判日本細菌戰爭罪犯的正義要求，不僅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今天在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內，好戰分子正在進行各種戰爭準備，包括原子戰爭與細菌戰爭的準備，他們並企圖把日本作爲其進行侵略的基地。我們對於日本重要戰犯的審訊，將同時警告一切好戰分子，打擊他們的毒辣陰謀，而有利於世界和平與人類的福利。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審判細菌戰爭罪犯，爲人類安全而鬥爭

新華社社論

我國外交部李克農副部長今天代表我國政府答覆蘇聯政府，完全同意蘇聯政府二月一日照會關於成立特別國際軍事法庭以審訊日本細菌戰爭罪犯日本裕仁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行雄等人的建議。

我國政府的這個立場，完全反映了我國人民對於日本細菌戰爭罪犯的無限義憤。自從蘇聯公布伯力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公審山田、高橋、梶塚等戰犯的結果，而我國黑龍江、湖南、浙江等地人民又根據親身的經歷加以證實以後，全國人民對於日本細菌戰爭罪犯紛紛要求嚴懲。中國人民一致擁護蘇聯政府二月一日的建議，這是容易理解的。中國人民親自遭受了日本戰爭罪犯的屠殺毒害，不能不要求報復。中國人民不能不要求懲辦罪惡滔天的日本細菌戰犯，這是中國人民爲了伸張正義和保障安全的神聖權利。中國人民決不能接受那種認爲日本戰犯審判已經結束、日本天皇已被豁免，因而即令發現主持細菌戰爭這樣的罪行也不應當對裕仁天皇和其他罪犯舉行審判的無耻詭辯。正義的日本人在看到他們的天皇曾經如此地犯了滔天罪行之後，自亦不能反對對於天皇的正義的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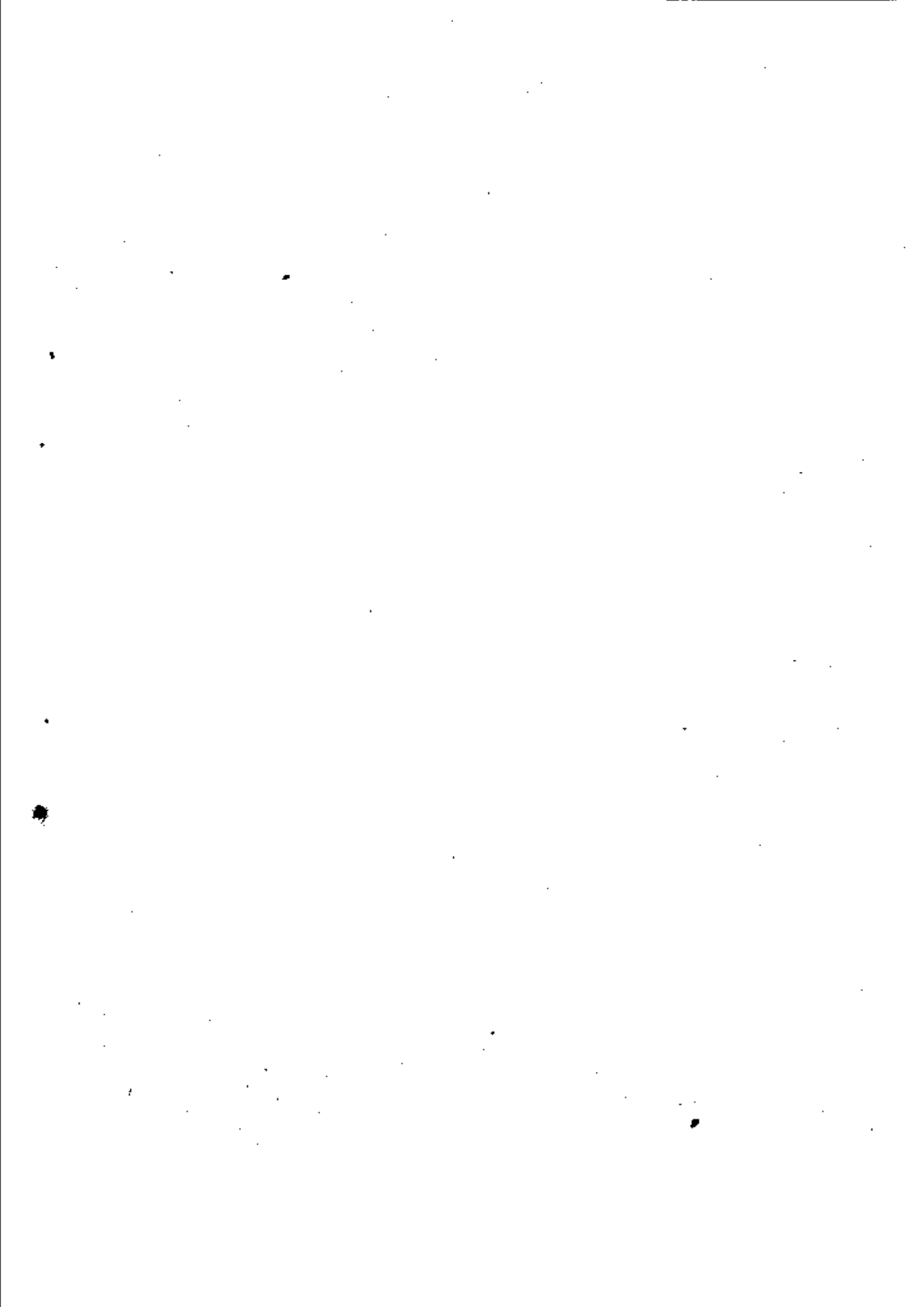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要看：對於屠殺了中國人民的日本細菌戰爭罪犯，有關各國究竟採取什麼態度呢？事實明顯極了：誰要是主張對這些滅絕人性的罪犯加以審訊治罪，他便是反對日本侵略者，反對細菌戰爭的人，他便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便是人類正義和安全的朋友。反之，誰要是藉詞推諉，反對審訊懲辦日本細菌戰犯，他就是包庇日本侵略者，擁護細菌戰爭的人，他就不是中國人民的盟友，他

就是仇視人類正義和安全的人。

我們知道，美國政府是不願意懲辦日本細菌戰犯的。這不但因為美國政府正在庇護日本侵略者，而且因為它自己也正在計劃細菌戰爭，如同計劃原子戰爭一樣。但是美國政府從來都聲明它並沒有這樣做，而且聲明它是人類和平的救星，中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最甜蜜的朋友等等。好吧，現在是圖窮匕見的時候了。美國政府和其他各國政府如果要證明自己確是中國人民正義和安全要求的同情者，它們就應當和我國政府一樣，立即同意成立特別國際軍事法庭，審訊並懲辦日本裕仁天皇和其他細菌戰犯。如果不然，美國政府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帝國主義面目，證明自己是日本細菌戰犯的保護人和幫兇，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是全人類正義和安全的仇敵。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

附 錄



日寇製造殺人細菌的舊地鞠家窰人民的控訴

日寇製造殺人細菌的罪行，已獲得黑龍江省安達縣鞠家窰居民的證實。記者會訪問了鞠家窰附近的日寇飛機場的舊地，那裏就是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審判日本細菌戰犯時戰犯川島清所供稱的專門繁殖鼠疫跳蚤的場所。

鞠家窰在黑龍江省安達縣城東三十五里，附近有一塊方圓七里大的飛機場，這就是從前日本法西斯戰犯們製造殺人細菌的地方。一切建築與設備，雖然已被他們在投降前焚燬，但留下來的殘跡和當地人民的控訴，都充分證實了日本法西斯的萬惡罪行。

從村莊到飛機場的荒道，滿長着比腰深的蒿草和一片片乾枯的蘆葦。當地人民指證，在偽滿時機場是被森嚴地警戒着，四週都樹立有寫着「誰上這來，格殺勿論」的木牌子。機場北部有幾個丘陵狀的山包和幾條縱橫的深溝，這就是所有的建築和設備的所在地。日寇在逃走時把它們都燒光了。現在地上還有一塊塊被火燒黑的磚頭，以及傾塌的水井、馬棚、牛欄和豬圈的殘跡。據當地居民組長楊老頭說：「日本人在這裏造的房子都是，房頂離地面才三尺高，爲的是怕人看見。那些一條條的壕溝，就是那時的房框子。」在這些縱橫的壕溝中，有一條最深的，據說就是製造細菌的工廠的舊址。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駐在安達的日軍通過偽滿興農合作社，向各戶強要活老鼠和大限賊（比黃鼠狼短而粗，毛黧黑色），向學生要的更多。全縣一萬五千多小學生被迫成天到野外去捉老

鼠，一共捉到十幾萬隻，都送到鞠家窩飛機場去。

另外，日本人還強迫每個學生獻納半斤牲畜毛和三兩乾血粉。日本飛機在湖南常德地區散佈鼠疫病菌的時候，除散播染有鼠疫細菌的穀物外，還把染有鼠疫菌的跳蚤附在羊毛球和棉花球裏投下。據當地醫院研究，乾血粉是用來培育細菌的。

離機場幾十里的修家窩居民鞠守忠，以親身經歷更提供了確實的證據。他說：我在「八一五」剛解放時到飛機場去，看見有一個地洞裏有許多鐵罐子和箱子裝着老鼠，另一個被火燒過的大地洞，有不少裝藥用的磁瓶子，瓶口封的很結實。當地居民指證，修築這個飛機場的時候，日本人爲了保持「秘密」，殺死了許多被驅迫修築機場的中國人。安達城區木業工人李永庭，曾被抓去做過木工。他說：「當修到裏邊重要部分時，日本人就不用本地人修，而完全叫那些被從關裏抓來的工人修。到飛機場修好了以後，那些工人都被殺害了。」

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還不止此。當地人民還控訴日寇將中國人作預防凍傷的實驗品和製造毒害莊稼病菌的罪行。安達城區的居民吳永祥說：「一九四三年冬天，日本人在正亞街（該縣縣城舊址）抓了不少窮人，晚上押到無人地方用涼水澆，再拉到外邊凍，過不幾天，在南門和北門外，看見有六具屍體，都凍着很厚的冰。」另一居民張鳳九也說：「同一年冬天，日本人在正亞街還抓過二十多個要飯的乞丐，將他們趕到城外脫光衣服凍，凍了又用火烤，經過這樣幾次凍烤，那些乞丐都被弄死了。」在縣城西南靶場，日本人還設了一個製造莊稼病菌的試驗場。一九四四年麥子上漿時，日本人強迫各學校學生到麥地裏用藥水注射麥子，結果麥子都生了黑穗病。這一年和第二年，日本人又向各村農民要各種烏米，用來製造毒害莊稼的媒菌。

安達縣的人民聽到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細菌戰犯的消息，都表示熱烈擁護。四年多來，流行性傷寒和馬病、牛瘟在安達地區從未間斷。身受法西斯野獸們遺留下的毒害的人民，從痛

苦的記憶裏認清，只有蘇聯才是幫助中國人民擺除苦難的好朋友。他們說：要不是蘇聯紅軍解放東北，咱們安遠縣的人，現在恐怕連骨頭都爛淨了。今天我們和蘇聯人民聯合一起，什麼細菌戰、原子戰也不怕。要是帝國主義敢再來這一套，那真是自討苦吃！

〔新華社瀋陽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電〕

前日寇細菌工廠平房地區視察記

重 嶺
桂 園

記者視察了平房車站附近日本戰犯的大規模細菌製造廠的舊地，完全證實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蘇聯濟海軍事法庭審訊的結果。在這個審訊中，日本細菌戰犯承認他們曾在平房車站設立大規模的細菌製造廠。

從哈爾濱向南行約二十公里即可到達平房車站。從車站向西望去，有一片被破壞了的建築物。無數紅色的斷壁和煙突，峭然屹立着，高大的鐵架子翻倒在地上。這就是罪惡滔天的日本法西斯昔日製造殺人細菌的工廠了。

這個細菌工廠，共分南北二廠。南廠距離車站只有三華里，是專門爲了昇降與修理飛機用的。場內建築有飛機庫和飛機場。北廠距離車站約十華里，周圍築有五、六尺高的土牆，牆外掘着三、四尺深的溝，形成一座荒野中的「小城」。城堡中的建築因爲遭受徹底破壞，現在已很難看出其原來的面貌。遠遠望去，僅有四個煙突和幾處不很高的殘缺牆壁。這就是細菌製造廠所在地。這裏有已被炸毀了的發電廠，有鐵路支綫，有汽車路，有被炸毀了但仍可辨認出來的化驗室。化驗室旁邊堆有白色、淡褐色殘缺不全的破瓷器炸彈片。在這座小城的東角上，有四行房子，四週築有長約四百米，寬一十三米，高一米的堅固洋灰圍牆。圍牆四週，每個門入口處都築有將近一米深的溝。在每行數十間的長房子牆上，建築有距離相等的四個方洞。在這周圍的積雪底下，發現了鐵絲鼠籠。這就是青鼠保菌的場所。整個工廠地區（南北兩廠包括在內），方圓共四十五公里。在這塊禁地範圍

園內，過去是被日寇極嚴密地封鎖着的。據附近居民說：進入廠內，必須經過四道卡子。如果是一個生人，不論他是有意無意，只要踏進這個地區範圍，那末他的生命就會立即斷送掉。不僅如此，日本法西斯把這裏週圍幾十里的村屯劃分爲甲乙禁區，凡在這塊禁區內出入的人，都要有特別證明，否則一概禁止通行。每當火車通過這塊禁區時，在前一站就要放下窗簾。每個車廂都有憲兵看守，如有旅客稍微轉轉腦袋，就有當場被捕的危險，被捕者輕則受審，重則生命不保。因此當地居民稱之爲「六十里地國境」。

附近居民並說：從修建這個廠子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就從遠處把整批的「勞工」和整車廂的驢馬、駱駝以及牛羊送到這裏面，却從來沒有看見再被運出或被放出去的。它好似一個可怕的龐大怪物，日日夜夜吞食着無數生命。爲了探知這件事情的一些內部真情，記者曾走遍這片禁地週圍的村屯，想找到一些會親眼目睹的人，幾乎是失敗了。因爲這裏的人已經很少。但最後終於找到了三個住在平房車站的農民。其中一個叫李日校，他曾在這個廠子外圍給日寇做了多年工。他告訴記者說，在一個秋天的晚上，有個名叫陳有的瓦匠，異常幸運地從禁地裏偷逃了出來。這瓦匠告訴李說：「一年以前我們一共有三百多人被抓到這裏來給日本人修築「轉樹樓」（指細菌化驗室）。可是每過些日子，就要丟失十個、八個人。到現在我們只剩下百十來人了。再在裏邊做下去，都得送命。」

另外還有一個農民叫傅景奇，也是在這殺人工廠的外圍給日寇做過工的。他說：在這個廠子的東北角，有一所不大的房子，旁邊有一個高煙突，煙筒時常冒着黃色的煙。每遇到颶風天，頂着風就可聞到一種使人發嘔的惡臭氣味。這所小房子現在已毀壞了，很難看出究竟是怎樣怪物。但它的高煙筒還依然矗立着。這堆廢墟的中間，還有約七八尺長的磚窖的殘部。無疑的，那無數被日寇殺死的人的屍體就是被它吞食了的。

日寇製造殺害牲畜的細菌的罪行，在農民陳芳盛的談話中，得到了證據。他告訴記者說：有一次，在雨後的一天，日寇拉着四頭驢到城子溝地區。他親眼看到當飛機投下了冒黃煙的爆炸物後，其中三頭驢立即死掉。另外未死的一頭，被詳細檢查以後又拉回那罪惡的重圍了。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麼人們一進入這個禁城，就無影無蹤的神秘了。

毫無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匪徒，在其遭到慘敗的時候，爲了消滅他們的罪惡蹤跡，在逃走的前一天，將這些建築盡行炸毀，把五六百個中國勞工圈在電網內，用機槍全部掃死。這些法西斯匪徒們以爲這樣就可逃脫人民的審判，卸却滔天罪惡的責任。但這些法西斯匪徒們，雖有辦法毀壞這些罪惡的建築物，他們却無法消滅掉罪惡證據。

日寇在逃跑時，會把這個廠子裏染有鼠疫細菌的大批老鼠放出來。這些老鼠很快就散佈到附近的鄉間。緊接着，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的夏天，這一帶就流行着鼠疫傳染病。從六月到九月間，這一帶屯子幾乎每天都死掉三、四個人或五、六個人，後來傳染病愈來愈擴大，有的甚至全家死絕，造成一種非常恐怖的慘景。僅根據老五屯、義發源、大東井子三個屯的統計，就有一百零三人死於這次疫災中。這筆血債以及其他各地的無數血債一定要日本法西斯魁首裕仁償還。

〔新華社哈爾濱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電〕

地下殺人工廠——東京是細菌戰的中心 日·『赤旗報』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將犯有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罪的山田將軍及十一名其他日本戰犯判刑的蘇聯軍事法庭，揭露了日軍曾在滿洲緊張地準備細菌戰爭的情形。日本準備細菌戰的中心，原來在東京，設在若松町的前軍醫學校中，其中心是在該校秘密建築物中的防疫實驗所。細菌專家先在這實驗所中受訓，然後派往滿洲。這實驗所設有巨大的地下實驗工廠，從事繁殖細菌並製造細菌武器。所有這一切，都是該防疫實驗所以前的一名僱員，前上尉軍醫官所透露的。此人現用假名中川義一。他還談到日本準備細菌戰的以下一些情形：

當時在該軍醫學校區域內，原有一處禁區，僅特殊人員才許入內。這禁區就是防疫實驗所，有數千名將級和其他軍醫官以及隨軍醫師，在前中將醫官石井四郎的指導下，在該所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工作。這實驗所從事培養霍亂、傷寒細菌（施用於水）、鼻疽病及其他病菌（施用於馬及其他牲畜）、瓦斯壞疽病細菌（施用於人）；研究使用這些細菌與防禦這些細菌的方法，研究從空中散放這些細菌的方式、方法，研究如何爆炸裝有這些細菌的地雷、榴彈、槍彈和在水面上爆炸的玻璃彈，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該所所長、前中將石井四郎告訴該所工作人員說：「軍事醫學不僅僅是治療和預防的方法，真正的軍事醫學，其目的在於進攻。」為鼓勵該所工作人員起見，曾攝製並放映電影，描述蘇聯軍官如何被慘酷致死，描述將鼻疽病細菌注入馬的肌體致馬於死，和檢驗馬屍的全部過程。

爲進行試驗起見，會將動物的血液注入人體中，會將人關閉在傳染有炭疽熱病細菌的房屋中，並會從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將被弄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的頭顱和軀體的各部分，保存在日本，以供研究之用。這種事情是很多的，被餓死的囚犯的屍體，被完整地保存起來。在一個特別的房間中，存有因被用作實驗而喪命的二百餘名軍人與平民的死亡情形的材料登記表。唯有這一實驗所的工作人員，才允許進入這一房間，而且在進去之前，必須簽名具結，誓不將見到的情形告訴他人。

在該軍醫學校的地下室中，設有巨大的秘密工廠，使用運送帶的裝置，從事製造細菌武器和繁殖細菌。石井中將本人會稱：這一工廠是創造細菌武器軍火工廠的模範。

作爲日本細菌戰中的一段插曲，是在戰爭將要結束之前，曾計劃施放氣球，其上裝置帶有山炭疽熱和壞疽病細菌的炸彈，以襲擊美國。在戰爭期間，這防疫實驗所和地下工廠在東京某次被猛烈轟炸時，會受到相當大的破壞，以後有一部分被遷往秋田和新瀉，在戰爭結束時被全部破壞。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電據塔斯社消息】

一個目擊者的控訴

蕭凡

——關於蘇聯審判日寇細菌戰犯事件

我讀到蘇聯審判起訴書是在京滬路的火車上，作爲「目擊者」之一的我自然很容易地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景，唐澤供詞中的時間不錯，正是在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當時離開浙東甯波地區前到金華，這時甯波由於日寇的投擲鼠疫跳蚤而突然發生了鼠疫，很快地蔓延開來，無能的國民黨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亦不積極設法搶救，到後來鼠疫嚴重地區無法可施，只好加以封閉，不准和外邊接觸；有的地區就縱火焚燒，房屋東西以及一切人畜全部活活燒死，其慘狀難以形容，而損失之巨大，更無法統計。自然，這樣「硬幹」的辦法亦決不能解決問題，鼠疫並未因此而撲滅，而仍然四處流行，並傳到附近地區。鼠疫醫院都鬧人滿之患，一直鬧了很久，人民之損失是十分浩大的。

我到金華後又碰到了這樣的事情：當時日寇爲打擊人們的抗日情緒，屠殺中國人民，並以威脅早就動搖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向其投降，便在各城市進行轟炸。那時金華也不例外，每天上午敵機便在八詠江大橋車站等地投彈轟炸，國民黨政府機關首先帶頭逃警報，每到晴朗的好天氣，便如一座死城，陰森可怕。一天，敵機又來轟炸了，在大橋附近轟炸了一陣之後，隨着飛機的低空掠過，上空「嗖嗖」的一陣響，大片黑點子飛速的降落下來，防空洞裏人們一聲驚叫：

「咳，大批炸彈下來了。」

一齊都往防空洞深處躲去，可是過了一會，飛機聲漸小，而外面沉寂如故，沒有震天動地的爆

炸聲，走出防空洞後，才知道在大橋附近投下了許多裝滿泥土的麻袋，麻袋震裂後，泥土裏跳出了無數跳蚤，向四處跳散了。於是這個地方迅速地戒了嚴，不准人們往裏走，（在這裏邊的只好倒霉）麻袋也不敢去動牠，因為人們知道甯波的鼠疫，也是這樣一大堆麻袋傳開來的。自那天起，敵機又接連來投了幾次麻袋，之後不久，鼠疫便在金華發現了，患者的症狀和鼠疫病狀完全一樣，不少人因而不治死亡。到後來真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真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看到老鼠，又害怕又恐慌，一直到冬天後才稍爲好一點。金華一帶受災的情形較甯波等地爲輕，但是日寇這一殘酷獸行所留在人們記憶裏的深刻印象却是永遠不會忘却的，今天，我在京滬車上讀着蘇聯的起訴書，我又不禁想起了這一段事情。

中國人民對於滅絕人性的日寇所加之於我們民族的無與倫比的深重災難，是永世不忘的，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但善良不等於懦怯和昏聩。中國人民十分清醒地知道：對於這些日寇戰犯，是必須毫不留情地予以懲辦的，如果對他們談「寬容」，那將是最大的罪惡，正因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因此他們更要求嚴懲戰犯，否則，無數在戰爭中死去的人民在地下也是難以瞑目的。但是抗日「勝利」之後，熱衷於進攻中國人民的蔣介石對於這些戰犯，竟大談其「寬大爲懷」，而讓大批的罪魁禍首又返回匪巢，在麥克阿瑟的庇護下，休養生息，以便將來捲土重來，再度進攻中國人民。

對於戰犯處理上的二種截然不同態度，十分明顯地劃清了今天世界上的兩個陣營，兩條戰線，一邊是以美帝麥克阿瑟爲典型，他們對戰犯愛護無微不至，積極培植，最近又釋放了幾個有名大戰犯。一邊則是以蘇聯爲首，他們代表着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舉行正義的裁判和懲辦，他們喊出了全世界人民心底的呼聲。

作爲日寇暴行「口擊者」之一的我，是十分感激地擁護蘇聯對於日寇細菌戰犯的正義裁判，並認爲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對於美帝麥克阿瑟在執行的庇護日本戰犯——這羣戰爭的禍根，和

平的死敵——的行爲，我表示無法容忍的抗議。

〔節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新華日報」〕

日寇曾在我國散佈鼠疫毒菌

據湖南常德華德醫院院長譚學華醫學博士報告，日本戰犯曾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使用飛機散佈鼠疫病菌殺害中國人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日機一架在常德城區投下穀麥等物很多。當時防空指揮部、警察局和鎮公所等機關會收集這些穀物，送請華德醫院檢驗。該院院長譚學華即用這種穀麥放在無菌生理鹽水中沉澱，再取其沉澱作塗抹片用革蘭氏的染色法染色後，在顯微鏡下發現這些穀麥內有多數的革蘭氏「陽性桿菌」和少數「兩極着色桿菌」。根據這種初步檢驗的結果，譚學華懷疑日機散佈的是鼠疫病菌，乃作第二次檢驗，將日機投下的穀麥和雜糧行取來的普通穀麥作比較檢驗，經過同樣的培養，又發現日機投下的穀麥沉澱中除有多數革蘭氏「陽性桿菌」外，並有少數革蘭氏「陰性兩極着色桿菌」。這次「陰性兩極着色桿菌」的發現，更使譚學華認定日機所散佈的是鼠疫病菌。在日機投穀麥八天以後，即十一月十二日，常德城區發現第一個鼠疫嫌疑病人，名蔡桃兒者，入華德醫院就診，但在入院三十六小時以後即不治死亡，其症狀與鼠疫病類似。當時，紅十字會已派救護隊到常德區進行救治工作，該隊隊長坎特（或譯肯德）醫師即會同譚學華將這個鼠疫嫌疑病死者的屍體解剖，發現死者的肝臟、肌囊、脾臟、腎臟等都腫大，當將其脾臟內血液抽出檢驗，又發現有多數「兩極着色桿菌」，與其脾臟血內所發現的完全相同。其後，他們再將脾臟血液中的細菌加以培養，則發現所有「兩極着色桿菌」都為革蘭氏陰性，證明這些細菌實即鼠疫桿菌。

以上檢驗結果，經長沙湘雅醫院醫師呂壽軒和紅十字會細菌學系主任陳文貴等先後檢驗鑑定，都確認為鼠疫桿菌。當時常德城區自發現第一個患鼠疫的病人以後，連續發現患鼠疫的病人很多，都在短時間內不治死亡。從這些死者的屍體中，也同樣發現鼠疫桿菌，證明日機投下的穀麥等物，確係爲了散佈鼠疫病菌，毒殺中國人民。當地人民一致擁護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對主謀細菌戰的日本戰犯的審判；並認爲侵略中國的日本戰犯們必須受到嚴厲懲罰，以償付他們對於中國人民所負的無數血債。

【新華社長沙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電】

二

據浙江省人民政府衛生廳職員王毓燾、鄭介安、俞漢杰、金秋等提出的書面報告，證明日本戰犯在侵略中國戰爭中使用飛機在浙江各地散佈鼠疫病菌毒害中國人民。該報告詳述日寇當時在寧波、衢州、金華等地，散佈鼠疫病菌的經過。報告稱：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有日機一架侵入寧波縣上空，低飛盤旋，撒下麥子、棉花很多。約一星期後，十月二十九日，寧波縣發現第一個鼠疫嫌疑病人，經醫生檢驗鑑定確爲被傳染鼠疫，此後陸續發現鼠疫病患者共九十九人，其中九十七人都都不治死亡。同年十月四日，有日機一架空襲衢州縣，也同樣散佈麥子、粟子等物很多，其中且混有跳蚤。這種跳蚤經過檢驗，確係「人鼠共同蚤」。在日機投下這些麥子、粟子等物後，至十一月十二日該縣就發現有鼠疫病患者二十二人，都不治死亡。至第二年即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以後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衢州縣曾三度遭受鼠疫侵襲，因被傳染鼠疫而致死亡的人數，前後共達二百零一人。金華縣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有日機兩架分兩次侵入市空，在空中散佈白色煙霧狀的東西。這些東西落在地面即成淡黃色細小顆粒，遇水即溶化。經該地民衆醫院檢驗結

果，發現這些溶液內都有華蘭氏「着色陰性桿菌」，證明確係「鼠疫桿菌」。此後陸續在金華附近的東陽、義烏、蘭谿等縣，都有鼠疫蔓延。東陽縣被傳染鼠疫病的有九十四人，死亡九十二人。義烏縣被傳染鼠疫病的有三百零八人，死亡二百五十七人。蘭谿縣被傳染鼠疫病的有三十六人，死亡十二人。

王毓榛等在報告中，對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忽視人民生命安全，表示憤恨。日機連續在浙江各地散佈鼠疫病菌時，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僅不採取適當措施，反爲敵人掩飾，認爲敵人不致使用細菌作戰的。當時國民黨的御用報紙，對日機散佈鼠疫毒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也隻字不提，使浙江人民遭受鼠疫的毒害含冤不自達十年之久。此次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對日本細菌戰犯的正義審判，始將過去日本細菌戰犯的罪行予以揭露。浙江人民堅決擁護蘇聯的照會，主張組織特別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裕仁等日本細菌戰首要戰犯。

按王毓榛係前偽浙江省衛生處技正兼防疫科長，鄭介安係技正兼醫政科長，俞漢杰係總務科長，金秋係統計室主任。

〔節自新華社杭州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電〕

日寇細菌部隊在北京製造毒菌的事實

蘇聯發表了對日本細菌戰犯的起訴書後，關於日軍準備細菌戰爭的事實，又有新的證據。據日共中央機關報「赤旗報」一月十日載稱，日軍不只在東北，而且在北京也曾駐過細菌部隊，設有細菌兵器的培養所。該細菌部隊在日本宣佈投降後，即用卡車把培養細菌的一萬個汽油罐運走消毀。據該刊載當時在該部隊當衛生兵的松井寬治（現任日本電器產業工會神奈川支部執行委員）於一月九日訪問日共東京代代木黨部，追述當時情形如下：

「我應召入伍，在滿洲受了三個月的步兵訓練，於昭和二十年（註：即一九四五年）四月被調到北京，派入一八五五部隊篠田隊做衛生二等兵；這就是細菌兵器研究所，主要培養鼠疫菌和跳蚤，準備對蘇作戰。這個華北派遣軍一八五五部隊，是屬於當時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官前中將下村定指揮的部隊長是前軍醫大佐西村英二，本部設在北京的名勝——天壇的近旁，表面上做的事情是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工作部門設有第一課（病理試驗）、第二課（菌苗製造）、第三課（細菌兵器研究所）。這個部隊除在北京設有本部外，並在開封、天津、石家莊、張家口、青島、太原等地設有支所，部隊全體人員在一千名以上。

第三課設在北京國立圖書館西鄰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內，工作是：（一）大量生產跳蚤；（二）大量生產鼠疫菌；（三）結合跳蚤和鼠疫菌；（四）從飛機上撒布的工作等。這個隊的隊長篠田

統，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理學博士，是大佐待遇的軍佐。在他的下面有軍醫將校二名、將校待遇軍佐三名、衛生下士官六名、衛生兵四十五名、女子軍佐三名、下士官三名、中國苦力五名，此外還有北京高等女子學校的日僑少女十名。

在該所的地下室內，有細菌培養室、動物室、下蒼蠅培養室、瘧疾研究所；二樓全層是跳蚤培養室。

第三課根據工作內容又分第一工作室（跳蚤的生產）、第二工作室（蒼蠅的生產、瘧疾研究）、第三工作室（鼠疫菌的生產）、小動物（鼠）室等。在工作時間內，總是在門內加鎖，時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畢後回到營房，關於工作內容的話，是一句也不准講的。上級吩咐過：星期天到外邊走，即使遇到憲兵問起部隊的內容，也不要照實回答。……

跳蚤的發育需要黑暗及攝氏二十八度的氣溫和百分之九十的濕度，因此，研究所二樓的窗總是關起來的，玻璃的內側塗上了黑漆，室內經常黑暗無光。爲了保持濕度，在走廊和各房的天花板上，都吊着破布，每隔一小時噴霧一次，在地階上經常貯有二吋的水。附於各房的水蒸氣管活瓣，不斷輸送水蒸氣進房。房內整天都瀰漫着水蒸氣。房內擺有數列木棚，上面放着無數的汽油罐，罐內裝滿着跳蚤，在罐的裏面，放有小籠，裝着老鼠，做跳蚤的食餌。對於這些被幾千個跳蚤吸血的老鼠，每天都給與食物。老鼠經過四天至一星期便死去，因此，每天早上都要將死老鼠拿到地下室去，做養蛇室的食餌。

聽說在我被調入該部隊工作前約一年，那裏會進行過人身實驗，有兩個中國人因此被犧牲了。實驗內容詳細情形雖不得而知，但據說那兩個中國人是手脚被綁起來，口裏被塞着東西，被裝在麻袋裏面，在白晝間，被用卡車從北京市內運到部隊駐地，經過一個星期便死了。

還有，據我從尾崎技師那裏聽到的話，在一九四二年，有一次會通宵大量生產跳蚤，運到外面

去；同時，據說會舉行過對空中實驗，得到了圓滿的結果。

八月九日（註：一九四五年）蘇聯參戰後，細菌研究所的人員都拿起槍出動到張家口方面去，工作停頓。

不久，到八月十五日，戰事便結束了。在那天正午的無綫電廣播二十分鐘後，隊長篠田便下令破壞細菌研究所。破壞工作繼續了三天三晚，通宵達旦。在後園裏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裏面去，然後洒上汽油焚燒。重要書籍和細菌培養器具也都被燒燬了。培養跳蚤的汽油罐一萬個被卡車運走。

戰事結束後第七天，我們便做完了破壞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時，又下令解散部隊，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稱從華北派遣軍的名冊上塗去，所屬官兵都轉屬到各陸軍醫院去。……同年十二月，隊長篠田統、軍醫大尉高岡滿和軍佐技師尾崎繁雄三人脫離了軍籍，穿起了西裝，蓄起頭髮，扮成日僑，搭登陸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長時間孝也轉歸了步兵部隊，同年十一月混入了其他部隊回國。我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因盲腸炎入醫院，經施手術後化膿，直到三月尚在病榻上過日子，直至同年四月四日。因此後來的事情怎樣，我便不得而知。那細菌研究所的幹部恐怕沒有一個成爲戰犯嫌疑犯，全體都回國了。」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電〕

二

此間人士已證實日寇曾在北京駐紮細菌部隊，並設有「細菌兵器培養所」，製造大批細菌武器。前中央防疫實驗處（現北京天壇防疫處）、靜生生物調查所人員，都證明日寇曾在北京駐紮過細菌部隊「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隊」。他們所報告該部隊的情況，與該部隊篠田隊長衛生兵松井寬治一

月十日在日共中央機關報『赤旗報』上所揭露的該部隊情況完全符合。天壇防疫處最近並已發現該部隊殘留的六管標着日本女人名字的特別菌種，經過培養接種後，證明全是毒性很大的鼠疫桿菌。

靜生生物調查所大樓位於國立北京圖書館的西鄰，除地下室外，共有三層，有房六十多間。第三層大部是平台。篠田部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進佔該所。日寇投降後接管該所人員夏緯琨等，曾在該所地下室內發現該篠田部隊第二課所留下的一張工作室說明圖，證明該所為大量培養蚤種場所，圖上註明：『平時只二層樓西半部養蚤種，作戰時二、三層樓可全部養蚤。作戰時最大生產能量是二萬四千七百瓦。平常養蚤最合適的數量是一千六百瓦。』此外，同一地方還發現了『蚤幼蟲期的飼料和成蟲發生量的關係』的圖表，以及該部隊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蚊蚋的像片。該所老工人門子華、高文元說：篠田部隊佔據該所時，二層樓上是不許任何中國人上去的。在上二層樓的樓梯頂端，按了兩扇門，日常總是鎖着。日本人上去時，也要脫了衣服，按電鈴後，才許進去。每逢有大卡車開到所裏時，卡車都是嚴密遮蓋，而且開進大門後，日本兵就馬上關起大門，並把中國工人堵在後院，連下班都不許出去。該部隊部長西村英二來時，也是把中國工人都堵在後院，嚴密戒備。樓裏平時溫度很高，每年只七月份停燒暖氣鍋爐一個月。院子裏有用洋灰溝圍起的三塊直徑六米的圓草地。日本兵囑咐中國工人不許靠近，說草地裏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許多乾血塊碾成血粉。按照該部隊殘留的研究圖表的說明，血粉是養跳蚤的一種飼料。高文元曾負責餵幾千隻白鼠、灰鼠、倉鼠、兔子等物。他還到車站接過一批山東老鼠，到北京各區公所收集過大量的蒼蠅。日本投降後，該部隊把中國工人都趕了出去，秘密燒毀各項文件、器具，拆毀各項設備。在投降後的十天內，門子華被叫回去修理水錶，看見日本兵正把他們按裝的二樓綠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換上普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後，該所還發現了七八個一尺多高的大玻璃瓶，裏面都滿裝着蒼蠅一類的東西。該所修理水管時，曾在地下挖出二十幾個破煤油桶和

燒過的大麥和老鼠。該細菌部隊在該處還建有一所四米見方的雙重門的沒有窗戶的小屋，另有地下冷藏室一所，都是供培養細菌兵器用的。

天壇防疫處在天壇西南，就是前中央防疫實驗處的地址。該處在日寇佔領時與現在南面的華北人民醫院是相連在一起的。日寇在那裏建築的房子不少，除去宿舍與病房外，工作室約有一百餘間。前中央防疫實驗處處長湯飛凡說：「我在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接管「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隊」所佔據的前中央防疫實驗處時，曾詢問有沒有毒性菌種，日本人說只有斑疹傷寒的菌種，因此只交出斑疹傷寒的菌種。但本處在今年成立菌種室後，收集全處各部門的菌種時，發現六管只寫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種。第一號是杉田幸平，第二號是杉田昭子，第三號是杉田奉子，第五號是永排勝子，第六號是杉田佳子，第八號是岩谷文容。六管菌種經過培養試驗以後，發現其中五管是毒性鼠疫桿菌，第八號的毒力可能已經消失。這是證明日寇曾在該處製造細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證據之一。」此外，在前中央防疫實驗處院內並有日寇遺留下的十一噸、十二噸、十三噸三個六公尺長的大消毒鍋，是用來將培養菌種的器具消毒的。倉庫內還存有大量的鉛質培養箱。據當時在該部隊工作的機械匠陳康延說：日寇在投降後不但毀掉很多文件器材，並曾用坦克車大量地壓毀或燒毀很多鉛質培養箱。他並說，當日寇在這裏時，有兩個工人每天專門作刷煤油桶和揭桶蓋的工作。每天有大批這樣做好了煤油桶，用卡車送到靜生生物調查所去。培養動物的小動物室的規模也是極大的，有四排房屋，共約七十餘間，每間室內可飼養數百隻甚至一千隻老鼠。日寇曾用麻袋大批運來血粉，作為細菌培養劑用，到現在為止，人民醫院北面的地下還會埋有日寇用剩的血粉，下雨時還有腥臭味。

【新華社北京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日電】